

7

2020年1月1日
总第07期

读书界 READING

读书界

总第07期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



回眸历史 不忘初心

第

07

期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王蒙：读书要找准两个平衡点
余秋雨：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
贾平凹：读书要读精品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

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习近平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

值此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之际，我谨向长期致力于传承弘扬甲骨文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开展甲骨文研究和应用，培养了一批跨学科人才，经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甲骨文研究取得显著成就。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9年11月1日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习近平致甲骨文发现 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始末

任宇波 吕伟达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的京城，年过半百的王懿荣近日身染疟疾，病情时好时坏，四处求治未果，让他略有焦躁。这日，一位友人探得个老中医，为去开了剂药方。王懿荣发现药方中的一味“龙骨”，寻常未见，且只有鹤年堂(一说达仁堂)药铺才有此药。

待家人将药抓回来，王懿荣打开药包查看发现，这些“龙骨”原来是大小不一的骨片，其中有许多非常规律的符号，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字体又非籀非篆，他翻看再三，摩挲良久，一时难解。

为一探究竟，王懿荣派人赶到鹤年堂，将文字较鲜明的全部买下，并许诺以后将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有字的“龙骨”。不久以后，山东古董商人范维清一干人等，携带“龙骨”至京师，王懿荣视之为珍宝，以每板银二两如数收购，并为每人写了一副对联或条幅以示谢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范维清又带来了800余片“龙骨”，其中一片刻有52个字，王懿荣悉数收购。古董商人赵执斋又携来数百片，片片有字，王懿荣全数购下。最后，王懿荣所购“龙骨”达1500余片。

经过对“龙骨”的反复推敲、排比、拼合，王懿荣很快了解到这些“龙骨”是龟甲和兽骨，上面的符号是用刀刻上的文字，裂纹则是高温灼烧所致。“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最后，王懿荣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确属一种文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于篆籀的文字，即是早于先秦时代青铜器上的文字。王懿荣不满足于此，决定追根溯源，最终发现甲骨产自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小商屯的村民们在种地时掘得这些刻有明显“符号”的骨头，他们发现这种骨头有止血作用，治疗外伤疗效尤佳，便将它们收集起来卖到药店，并猜想这是古代龙的骨头，因而称之为“龙骨”。

甲骨文继而殷墟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使蒙尘三千多年的甲骨文字免于湮没，更避免了“人吞商史”的闹剧。

（本文摘自《大众日报》）



主 办: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主 编:赵荣栓 石军红

编 辑:赵纪彬

封面设计:李青春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建设东路46号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邮 编:453007

联系电话:0373-3328922

电子信箱:dsj20161009@htu.edu.cn

·领导关怀·

植根读书沃土
滋养读者心灵

李雪山

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李雪山 题词

·领导关怀·

让读书成为我们
的一种生存方式！

马治军

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马治军 题词



目 录

■ 聚焦馆务

- 图书馆举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专版报纸展/1
- 图书馆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老日记本精品展/2
- 图书馆举办“壮丽七十载 奋进新时代”主题书展/3
- 图书馆学习《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4
- 图书馆推出“借阅地图TOP TEN”/5
- 图书馆举办2019年度搜书大赛/6
- 图书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7
- 图书馆承办“河南省图书馆史与当代图书馆发展论坛”/9
- 图书馆举行阅读推广活动总结暨表彰大会/12

■ 读书论谈

- 王蒙：读书要找准两个平衡点/14
- 余秋雨：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18
- 贾平凹：读书要读精品/20
- 梁实秋：读书是最简便的修为/23
- 严歌苓：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26

■ 《论语》专辑

-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32
- 《论语》在日本的传播/37

《论语》在俄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48

《论语》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53

■ 美文粹读

重新开眼看中国/65

文化的寓言/71

安放心灵的三分菜地/74

洞悉“人生三味”/76

我们都是追风筝的人/78

追寻生命的意义/82

■ 微评专辑

微评《百团大战》/87

微评《长征》/88

微评《永不消逝的电波》/89

微评《亮剑》/90

微评《我和我的祖国》/91

微评《谁主沉浮》/93

■ 好书快讯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94

2019年度金石学新书/100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推荐好书/108

图书馆举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国庆专版报纸展

9月16日上午,“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专版报纸展”在图书馆新乡地方文献整理中心展厅开展。此次展览主要展出1951年以来有关国庆主题的《人民日报》《新乡日报》《平原晚报》等报纸,展览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激励广大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本次展览不仅吸引了广大师生和市民前来参观,也得到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9月16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臧振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岳杰勇与来我校录制“河南师大深入、扎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节目的河南电视台记者共同参观了此次展览,并于当日《河南新闻联播》对本次展览进行了报道。

(图书馆新乡地方文献整理中心 供稿)

图书馆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老日记本精品展



10月11日至31日，图书馆与新乡红色收藏家原兵法先生联合举办了红色记忆——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老日记本精品展。

本次展览活动是图书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展览受众广泛，吸引了包括新乡市收藏协会会员、收藏爱好者、退伍军人等广大市民和师生前来参观，参观总人次达500余人。在活动中，一位退伍军人参观后感叹道：“看了抗美援朝专题日记本，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更知今日之生活来之不易”。一位历史专业学生表示：“这些老日记本见证了新中国70年来的社会发展，记载着过去的历史，很有纪念意义，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展览”。

本次展览受到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平原晚报、新乡电视台的记者对本次展览进行了宣传报道，扩大了本次活动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广泛好评，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图书馆新乡地方文献整理中心 供稿）

图书馆举办“壮丽七十载 奋进新时代” 主题书展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0月12日,图书馆第二党支部联合采编部在图书馆二楼大厅举办“壮丽七十载?奋进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书展。



本次书展以建国后历史发展为线,精心选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航天等多方面书籍,力求反映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各方面取得的发展与成就。展览过程中,许多读者驻足观看,不时有学生询问这批新书何时上架,期待早日借阅。

本次书展的举办,有助于更多的读者了解伟大祖国70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增强师生们的民族自豪感和为社会主义明天奋斗的热情。

(图书馆采编部供稿)

图书馆学习《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11月5日下午,图书馆党员及科级干部在图书馆九楼会议室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本次学习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石军红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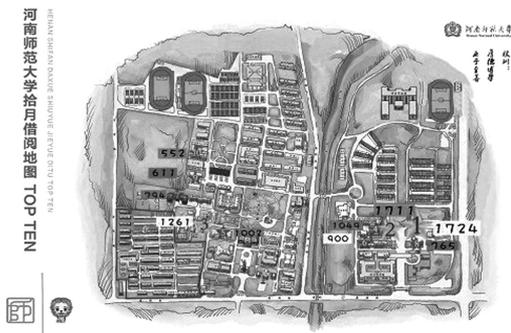
参与学习的同志们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论述,结合媒体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相关权威报道,重点围绕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石军红总结指出,在进一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一定要找准全会精神的亮点、热点,着力以问题为导向对全会的新表述、新理论展开研究,深化分析视角、厘清逻辑思路,结合我校党委具体要求,切实做好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宣讲工作,并用相关理论指导图书馆各项工作。

(图书馆党总支办公室 供稿)

图书馆推出“借阅地图TOP TEN”

为响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促进我校全民阅读深层次发展,图书馆于11月7日推出我校“借阅地图TOP TEN”。



“借阅地图TOP TEN”是图书馆基于大数据,分析我校25个学院(部)每个月借阅情况,选择前十名的学院在我校地图上进行标注而制作的借阅地图。通过“借阅地图TOP TEN”可以使我校师生直观的看到上个月借阅量前十名的学院在我校的所在位置,增加我校师生对学校 and 学院的自豪感以及阅读兴趣。

本次发布的是我校十月份的“借阅地图TOP TEN”,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十个学院上榜。今后“借阅地图TOP TEN”将在图书馆主页和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每月予以发布,方便各个学院及时了解本学院每个月学生的借阅情况,促进学生培养工作。

(图书馆胡玉文 供稿)

图书馆举办2019年度搜书大赛

11月12日、19日下午,由我校图书馆主办,读者协会协办的“2019年河南师范大学搜书大赛”在图书馆规定场地举行。全校约三百名学生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9年度搜书大赛分两期举行,11月12日为个人赛,11月19日为团体赛,每一期都有各具特色的比赛方式。个人赛分三层楼举行,每层分两大轮六小轮同时进行;团体赛一组两人,一轮十组,分两轮进行,相应书籍穿插分布于三层楼之间。在参赛人员签到,主持人介绍完比赛规则之后,下午两点半活动正式开始。比赛过程中,参赛者根据书单上的信息寻找图书,拿到书中信息条后,将书放回原位,完成参赛项目规定要求。比赛期间,气氛紧张而激烈,严肃又不失乐趣,参赛者积极寻找书籍,志愿者维持现场秩序,活动有序地进行。

本次活动通过一种寓教于乐的形式,有利于提高同学们参与图书馆活动的积极性,使同学们更加熟练掌握查找图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提升同学们对图书馆资源的利用能力。此次活动也有利于促进图书馆和读者协会不断创新进步,有助于我校培养全方位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推动“双一流”高校建设。

(图书馆胡玉文 供稿)

图书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岗位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11月16日,图书馆领导班子和全体党员到济源市开展学习“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增强党员党性修养”主题教育活动。

在愚公移山精神教育基地,参会人员集体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愚公移山》原文,深刻领悟毛主席、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

在黄河岸边的杜八联革命纪念馆,党员们在认真聆听了讲解,参观了翔实的图文资料、实物,深切



读书界 |

感受到杜八联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斗争中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体会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杜八联革命精神之后被革命先驱不怕吃苦、勇为人先的革命精神所动容,责任担当意识进一步增强。

在小浪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体党员详细了解了中国治黄史上的丰碑、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最具有挑战性项目——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建设历时十年时间,创造三项世界纪录、六项中国纪录的伟大工程深刻体现了建设者“敢想敢干、开拓进取、坚韧不拔、团结奋斗”的新时期愚公精神,同志们被这种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打动。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石军红在活动结束后的总结会上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是图书馆党总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本次党日活动后,党员干部可以带头检视自我,认真感悟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严守政治纪律,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发挥党员先进模范带头作用,以饱满的精神,务实的工作作风,投入到图书馆工作中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强的担当精神为图书馆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图书馆党总支办公室 供稿)

图书馆承办“河南省图书馆史与当代图书馆发展论坛”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眸历史,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在最近几十年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由藏书楼到现代层出不穷的未来图书馆新概念。为进一步坚守“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推动河南省高校图书馆服务向广度与深度的发展,展望新时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前景,2019年11月22日至11月24日,河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承办,中科软股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协办召开河南省“图书馆史与当代图书馆发展论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焦军普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的开幕仪式。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副主任、河南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崔波研究馆员,河南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张怀涛研究馆员,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赵荣栓教授发表会议致辞,欢迎各位嘉宾代表参与到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研讨中来,阐述了本次会议对高校图书馆特色服务、科学研究以及新时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总结了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并对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功申报者李景文研究馆员、史鸿文教授及历届申报成功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祝贺。三位致辞嘉宾分别表达

读书界 I

了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蓝图与愿景。

本次论坛专家报告环节由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赵荣栓馆长、河南大学李景文教授、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孙海双馆长三位嘉宾分别主持。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苏全有教授总结了图书馆史编纂的意义,提出了发展图书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并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进行了流程化梳理,指明项目申报工作的重点环节与注意事项。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图书馆馆长史鸿文教授就《中华水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分享专题报告,从中华水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的角度,提供了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学科服务的新思路。史鸿文教授总结团队项目申报经验,对项目选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河南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李景文研究馆员从项目申请人与评审专家两个角度分别进行了项目申报与评审过程中的经验分享,强调了项目申请的心态问题,提出在项目申请过程中需要保持信心、精心与耐心。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谢琳惠研究馆员就《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河洛地区名家家谱收集、整理与研究》分享专题报告,从家谱文化案例出发,梳理了立项、研究、结项过程中,课题组对河洛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总结了项目案例对推动谱学研究、传承优秀河洛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王瑞珍副馆长从近两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和立项数据出发,阐述了国家社科基金对高校及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性,并从学校、图书馆、个人三个层面介绍了项目申报的工作思路和实践方法。中科教育大区经理张岩从智慧图书馆视阈出发,提出全生态周期知识服务的场景设计,强调智慧图书馆建设需重视智慧馆员、智慧技术、协同机制、企业担当等要素。

各参会代表对新时代环境下图书馆建设与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申报工作开展积极讨论。其中，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高建立馆长阐述了现有科研成果，现场分享了“老馆改造”项目经验，充分肯定了本

次会议的意义与价值，通过各位专家的分享与讨论，得到了项目申报过程中的新的启发与灵感，表示收获颇丰。

本次会议参观交流环节选择前往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新乡地方文献整理中心。中心秉承“搜集地方文献，服务教学科研；保存新乡记忆，助力地方发展”的理念，现已收集13000余册（件）地方文献。各参会代表在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石军红书记的带领下，参观了平原省文献、新乡地方史志、新乡家谱、新乡农村基层档案、新乡籍作家作品和新乡碑刻拓片等新乡地方文献特色馆藏体验区。

（图书馆党总支办公室 供稿）

图书馆举行阅读推广活动总结暨表彰大会

12月12日上午,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总结暨表彰大会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举行,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石军红、副馆长白新勤出席会议,图书馆阅读推广相关部门及获奖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本学期图书馆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平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阅读推广中心带动指导读者协会开展阅读推广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讲座报告、专题展览、读书漂流、诗词大会、搜书大赛、亲子阅读等品牌活动的策划及宣传;完成了你听我说、师小图讲故事、文声电台、文声书言、文声视界、文声vlog等线上音频和视频的内容制作和推广。

新乡地方文献中心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专版报纸展、红色记忆老日记本精品展、手抄新乡地方文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报纸展等活动。

采编部开展了每周新书推荐、名社书展及毕业生赠书回馈等活动。基藏部推出了线上专业类书目推荐。

信息咨询部开展了数据库每周一奖、微书评大赛、数据库线上迎新、有奖学习、微拍校园、经典品读、数据库讲座、建国70周年知识竞赛、图书馆检索知识线下有奖问答活动、甲骨文图片展等；积极宣传、组织参与各类数据库举办的26项线上竞赛活动，上述活动的开展，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也多次被省高校图工委表彰为先进单位。

石军红书记总结、肯定了上述工作成效，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上、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我校图书馆正是秉承着党提出的新时代育人目标，围绕着这六个下功夫，开展了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今后将再接再厉把时代新人培养贯穿到图书馆的各项工作、管理和活动中去。

随后，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石军红、副馆长白新勤为“故事里的70年——‘峥嵘岁月红色记忆’微影(书)评大赛”、“超星杯‘牧野存经典卫水流书香’之微拍校园”、“中科杯‘峥嵘七十载·与国同梦想’知识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师生颁发奖品和证书。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供稿)

王蒙：读书要找准两个平衡点

第一，我读书不是读得最好的，有很多书别人读过，我都没读。还有别人非常热爱读的，我老读不完，比如说《战争与和平》，写得好，我也



看过多次，但是读不完。还有《百年孤独》，我也读过。有一次都读到五分之三以上，快到五分之四了，我死活不读了，因为觉得这位大师的路子已经被我给掌握住了，就不想再看了。当然还有《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没有读完。

人老了以后，回想一辈子到底读过几本书，印象真正深的没有几本，包括被反复阅读过的。《毛泽东选集》是反复背，不仅用汉语背还用维语背，印象很深。毛主席的逻辑、句法，包括反毛泽东的那些人，都在跟毛泽东学。还有《唐诗三百首》，不管编得多么差，有什么缺点，都是理论家说它有缺点；对于读者，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代替，你编一个新的《唐诗三百首》别人不愿意看。

真正读的书一是《红楼梦》，一是《道德经》。庄子好看，但是

看多了起急,因为有的地方分析得绝,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真正爱读的书,真正算读过的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个人总要找几本自个儿最爱读的书真读,其它的只能算浏览或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第二,工具书。什么都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特别是像我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人,全靠工具书,我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不但查《辞源》,而且查汉英辞典,学问就更大了。再查《百科全书》。我想起我女儿小时候的一个名言,她那时候看我老查辞典,就问她妈,这是什么书这么厚?我老伴说这叫辞典。她说辞典是干吗的?老伴说,你爸爸不认识的字就找它。我女儿说,我爸爸这么多字都不认识啊?她算抓住问题要点了。很多字其实咱们都不认识,中国人又特别讲究字。

每一个人要掌握自己最佳的读书和人生阅历的平衡点。中国有一些人,不读书但是鬼精鬼精,非常聪明,也很干练,甚至很有能耐,比读书读得多的人还能耐。为什么读书读太多反倒显得傻呢?因为中国的现实不按书本办,书本也不一定按现实写。如果你读得太多了绝对傻。但是不读书,你的本事再大,再干练,还是低水平。不过,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钱钟书就以读书为乐,但这个人绝对聪明,绝对不是傻子。有的偏于务实,读的书有限,但有限的书能够理解出花来,能用出花来。就这几本书陪他一辈子,你就觉着他的学问对他来说就相当够了。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但是你要找到自己最佳的。现在书太多了,一年出19万到20万种新书,不要说这些书读不完,读这些书名都读不完。

还要寻找一个平衡,即所谓博与专的平衡。这得视个人情况而定。读书与人生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我始终解释不了。我给

读书界 I

天才下了一个定义：集中精力；但是我又提倡一个人应该多有几个世界。到底怎么把它解释清楚？我说不明白。有时候我到大学讲课，很多人给我提一个问题：现在大学课程要学英文，一些学生的中文水平越来越低，可还把精力用在英语上。对此我又信又不信，信是因为中文的报纸、刊物、书籍错别字一大堆，令人生气。可是另一方面，我会想起那些历史上双语、多语的人物。外语学得好，你能有幸鸿铭学得好吗？他的中文怎么样？谁敢说比辜鸿铭的中文好呢？你外语学得好，你有林语堂学得好吗？林语堂双语著作，一些作品都是用英语写的。可是你看林语堂用中文写得怎么样？钱钟书外语也好。我想，外语越好中文就越好，因为如果外语你一点都不懂，中文的妙处你不知道，中文的特色你不知道，必须两相参照。另外，如果你的中文基础坏，外语能学好吗？连母语都说不清楚，你能学好外语吗？根本不可能。跟老婆吵架，那么点小事都解释不清楚，你改用英文解释你能解释清楚吗？更不清楚。你如果能用英文解释清楚，前提是你已经用中文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母语好是学好外语的条件，外语好是回过头来加深母语的条件。可这是理论，具体到一个孩子身上就麻烦。

第三，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类特别伟大的语言，包括《道德经》里边的那些语言，比如他讲到大道，那意思是在战争当中兵器伤不着他，到了水里水淹不了，到火里火烧不了。看这个你要一较劲，就这一段你能较三年，头发白了都不能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审美的理想，没有可操作性。

我看书，有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知识，有的是为了融会贯通。我既相信自然流淌，也相信一种驱动。你没有驱动装置，不给它一定的指令，等着电脑自个儿运行绝对不可能。两者都要

有。我不相信所谓下笔万言,但也不相信为写一个字,捻断三根须。大家都讲推敲的故事,故事本身很可爱,但是没必要那么推敲。读书也是这样。有人说苦读,头悬梁,锥刺股真是很感动人,可都这么苦读我不信。都是闲读、恬读,我也不信。学一个具体知识,背单词,没有点苦劲是不行的。

如果书摆在你家里,摆了二十年,忽然你想起一个什么事,你想找,最后找着了,非常高兴。可能就用了3分钟,翻一下,我认为这本书就值,这也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书也是一样,这么多书都没看,不看也别惭愧,你不能天天都看,但是如果你真想起什么事了,一下子想起来这儿还有一本书,挺满意,挺高兴。有一些怪知识,到时候一查就查出来了,真是高兴极了。就连找着那本书都很高兴,跟找着自己的“往日情人”一样,你藏在这儿了?丰采依然。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动的情形都能想起来。读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也非常感动。但你别没事老去看,老去看感情就没了。年轻时候看着特别好的东西不见得现在就好。有的书没必要老去看,会把一本好书看坏的。

(本文转自《京华时报》)

余秋雨：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

——年轻人要不要读书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这儿的人都不识字，妈妈从外面来了，她是这儿第一个识字的人，此后办起了识字班、学校，学校有个图书室，书不多，老师定下一个苛刻的制度，要写100个毛笔小楷才可借得一本书。读

书使人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我们家乡的人已经很富裕。

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社会关系、机遇、方向的正确选择等等，我认为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偶然看到的几本书，从这些书里面的某些地方获得了力量，从而把他拉出了平庸。只要跨过山坡，人生就不一样了。

——努力读第一流的书

读书的横向并不最重要，纵向才是重要的。所谓横向就是指各个专业，理工农医等；所谓纵向就是指梯度，所谓的一、二、三流。各学科的最高等级都是合在一起的。

像爱因斯坦去世前，有人问他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再也不能研究相对论了，而是说再也不能欣赏莫扎特了。

从事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找最高等级，要寻找“山顶”，“山顶”也许永远不会到达，但光辉会一直照耀着你！

——看和自己有缘分书

有人认为自己出生的地界,国家等等会决定自己的喜好。其实是错误的,出身并不决定你和什么有缘分,也就是和谁有同构关系。文学无国界,文学是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天域。比如,安徒生是丹麦人,丹麦语也是一个小语种,但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作品。所以,你可能喜欢欧美的、日本的作家,也可能喜欢非洲的。在阅读中寻找和自己有同构关系的书,其实,也是在寻找自我。

①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②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③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④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经沧桑的成年人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本文转自《语文教学通讯学术刊》)

贾平凹：读书要读精品



人活着不能没有钱，但只要有一碗饭吃，钱又算是什么呢？穷不是咱们的错，书却会使咱们位低而人品不微，贫困而志向不贱。中学生朋友，一定要把书看重，什么都不要眼红，但可眼红读书，朋友可以不交或少交，书之友不能一日

不交。贫困倒是当作家的准备条件，书是忌富，人富则思惰，要学会逼自己静心读书，深知书中精义。

好读书的坏处自然很多。譬如终生受穷别想当官，没个好身体，不是好丈夫，没有好人缘，性格古钻。但是，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处，譬如能说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

凡能找到的书，不管文学、政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

多,思路就不广。但是,切切又不要忘了精读,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世上好书,浩如烟海,一生不可能读完,而且有的书虽好,但不能全为之喜爱。比如我一生不喜食肉,但肉确实是世上好东西。你若喜欢一本书了,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便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又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

读书要读精品,你真真爱上一本书了,可以在一个时期多找些作家的书来读,读他们长中短篇,或者散文、诗歌甚至理论,再读外人对他的评论,所写的传记,也可再读和他同期作家的一些作品。这样,你就知道他的文了,更知道他的人了,明白当时是什么社会,如何的文坛。他的经历、性格、人品、爱好等等是怎样促使他的风格的形成。大凡世上,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一套手法,都是有迹而可觅寻,当然有的天分太高了,但不是一时一阵便可理得清的。我读中国的老庄、太白、东坡诗文,读外国的泰戈尔、川端康成、海明威之文,便至于起灭转接之间不可测识。说来,还是我读书太多,悟觉浅薄啊!如此这番读过,你就不要理他了,将他丢开,重新进入另一个大家。

文学(乃至其它任何艺术)是在突破中前进,你要时时注意,前人走到了什么地方,同辈人走到了什么地方?任何大家,任何名著,你只能继承,不能重复,当你学习它的时候,必须将它拉到你的脚下来读。这不是狂妄,这正是知其长、晓其短,师精神而弃皮毛啊。虚无主义可笑,但全然跪倒来读,他可以使你得益,也可能使你受损,永远在他屁股后面了。

从1971年投稿至1978年《满月儿》在京获奖至《废都》脱稿,我已写了22年,其间甘苦一言难尽。开始,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

读书界 I

投寄，四面八方退稿涌回来，我心有些冷，恨过自己命运，恨过编辑，担心将来一事无成，反误了如今青春年华，夜里常常一个人伴着孤灯呆坐。但竟有这样的事发生；熬夜到凌晨一点，困极了，只要说声睡，立即就睡着了，如果再坚持熬一会儿，熬红了眼，反倒没瞌睡了。于是想，创作大概也是如此。就发奋起来，将所有的退稿信都贴在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

可惜我住的水泥楼上没大梁。要不，系一条绳，吊一个苦胆，我要当勾践了。

大言者不语。只要真正寂寞，那便孤独，孤独是文学的价值，寂寞是作文的一条途径，这途径明明摆着，许多人一心想当文学家，却不愿在这条路上走，那有什么办法呢？诚然虚名可以浪得，但成名并不一定成功是如此无情。

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同我们一样的小人物也慢慢长大。

（本文转自搜狐网）

梁实秋：读书是最简便的修为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而今当书籍唾手可得，怎堪比专注的悦读盛宴？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希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简，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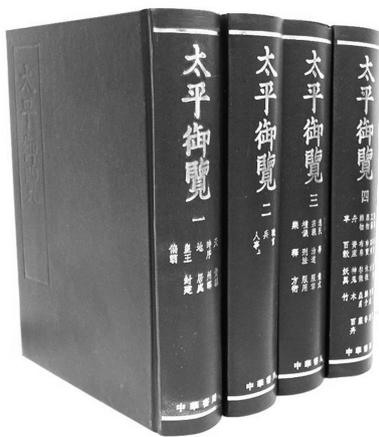
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钞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版、活字、石印、影印，乃至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精到。

物以希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

读书界 I

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



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

《太平御览》采集群书一千六百余种,分为五十五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

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

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

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贻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何以不读书,照镜便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

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还是读书。

书，本身就有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

（本文转自《漫谈读书》）

严歌苓：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一、我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记忆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

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

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

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记得大概20岁时,我写的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在了《解放军报》。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汇报”此事:“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发表了。”父亲当时特别高兴。他说:“真的,这才是我女儿。”

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当然能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那时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然后父亲就拿来一看,看完以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以后还是写点大白话

读书界 |

吧。”我听出来这是批评的意思，他可能并不认可我写这样的文字。这就是我跟父亲关于写作最开始的交流。

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了，父亲也跟我说：“你写作先天不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文革’时耽误了不少，基础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

“用功”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如果不每天五点钟“出林子”就没得吃。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认认真真的在家里耕耘。然而，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成都军区有很多部队要参战，需要随军记者进行报道，而短时间内又派不出那么多记者来。当时，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选择间徘徊。因为大家已经发现我很有文学创作的天分，领导就送我到舞蹈学院去学编舞，那我就要写舞蹈大纲，这时部队发现我还可以写。

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我要上前线去锻炼。由于刚刚打仗的时候很乱，初为记者的我只能去野战医院采访伤员。第一批采访作品发表后，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吃写作这碗饭的，从此以后，我就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一点东西。那时我就不跳舞了，我跳舞的条件很不好。我觉得艺术是关乎登峰造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能平平地跳两下，这不是自己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就放弃了跳舞。

当时在前线，大多数受伤的战士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我突然看到了真正的生与死，看到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在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残疾人。当采访每个负伤的战士谈及他们的家乡和父母时，每个人都好像有一个故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写这些人的故事。而这些人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更

觉得做一个跳舞的人,仅靠自己的肢体表达东西,这种表达方式太有限了。

二、丰富的人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其实很多大家,像沈从文,像高尔基,受到的正规教育非常少。沈从文读了五年私塾,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人性。

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家庭,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高干家庭的,有普通家庭的。他们中有男有女,有的年纪很大,有的年纪很小。这比一个连队要好很多,连队是清一色的农村兵,而且都是男性。

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我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个地方去演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诸如羌族文化、彝族文化、藏族文化等。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随后我又到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打工,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每天都有很多遭遇,这种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开始学英文,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五百五十分,我是五百七十七分。那个时候我连考三场,第一场才五百三十多分,但在两个星期之内考了三场,就积累了很多考试经验。当时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勤奋。

后来我到美国入校读书,这段时光弥补了我人生的一些缺失——那是我少年时代囫囵吞枣式乱读书造成的。学校里的读

读书界 I

书方式是非常系统的。书要用英文很系统地读一遍,《红楼梦》也是用英文加读过一遍的。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

在校时,因为选课超过三门外的不需额外交学费,所以我选了五门课程。五门是最大的限度,加之我获得当年的全额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五门课都不需要我付费。我很贪的,五门课程一起读了下来。实际上,这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这是段苦中尝甜的经历。记得上完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时,我对自己说,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真的是太苦了。

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这和“一分钟学问家”是完全不同的。

我写作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用途的。有时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会想:这能发表吗?像《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以后,会有人感兴趣吗?

这样的问题其实想来也徒劳。如果写别人都想看的,那么恐怕我写不出来。别人想看也好,不想看也罢,但我要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功课——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感兴趣,就要将其从内心呈现出来。当然,很可能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为人处世、快乐、幸福感都不一样。和看书一样,可能眼下得不到回报,回报也许在很多年以后,那么这个事你还做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现在回头看,除了悲凉、荒诞,还有很多那时未被理解的深意。

我们小时候喜欢下雨天去买菜,七八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冒雨到街上,不为别的,就为下雨时别人的钢 掉在地上的声音被雨

声遮蔽,便于我们去捡。这种经历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着,有很多小故事。这些故事不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或许,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在我个人看来,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与我自己不同的。比如像我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这样的农村妇女,《小姨多鹤》里面的多鹤,还有工人的妻子,都跟我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包括里面的男人,甚至比较负面的人物,实际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作家如果不能找到他和笔下人物相通的地方,哪怕他写与他很相似的人也写不好,那么就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张爱玲之所以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写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

我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旅居海外,走过西藏,在陇西高原上观望。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那段时光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部作品。

(本文转自《书香似故人》)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王国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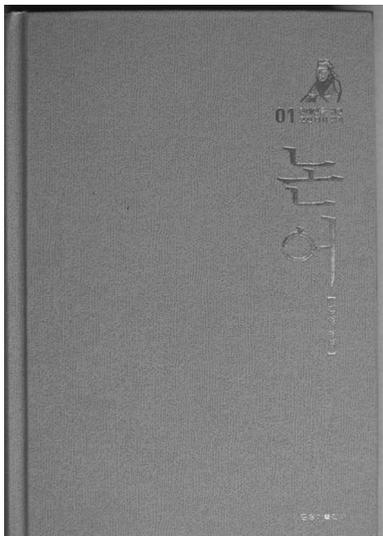
战国末期，燕人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半岛，并于公元前194年推翻了箕氏统治，建立卫氏政权，称为“卫满朝鲜”。此时《论语》已经成书，很可能被卫满等人带入朝鲜半岛。从战国末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及辽东的多年战乱迫使大量中国人避入朝鲜半岛。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难民也可能将《论语》带入。但这些只是推测，直到汉四郡时期，《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证据才真正出现。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施行有效治理，史称“汉四郡”。当时《论语》虽不在“五经”之列，但作为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不可能被忽略，因而被列为“小经”。1992年平壤古墓出土的竹简上写有《论语》的《先进》、《颜渊》二篇的内容。经研究，这些竹简是汉四郡时期乐浪郡下层官吏的随葬品，时间为公元前45年，比河北定州竹简只晚了10年，是迄今朝鲜半岛发现的最古老的《论语》遗存。从竹简的磨损情况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勤奋攻读《论语》，说明《论语》此时已经成为下层官吏的基础教养科目。

朝鲜半岛在公元前1世纪逐渐形成了高句丽（前37-668）、百济（前18-660）、新罗（前57-935）三大政权，史称“前三国时期”。《论语》在这一时期传播的确切记录已经出现，在三个政权统治范

国内的传播各有特色。

高句丽建国初期开始用汉文修史。故国川王时期(179-196)的乙巴素任国相(宰相)之前曾经说：“不逢时则隐，逢时则仕，士之常也。”这句话与《论语·泰伯》篇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句式、含义上很相似，由此能够看出他读懂并有意运用了《论语》。小兽林王二年(372)，“立太学，教育子弟。”这是朝鲜半岛设立太学的最早记录。



不过，《论语》未见于高句丽子弟所读书目，这说明在当时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教育体系中，《论语》还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

百济建国后不久也开始用汉字记事。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时期(270-310)，百济博士王仁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本传播儒家思想，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2005年韩国仁川出土了公元3-4世纪百济时期的《论语》木简断片，“这一发现说明，在百济时代关于孔子经典著作的学术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首都汉城，还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武王四十一年(640)“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三国史记》“武官”条载百济设“孔子庙堂”一职，但设立时间和官职高低不详，应当是负责守卫孔庙乃至国学的武官，可见百济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景仰。较高句丽而言，百济的《论语》传播很有特色，在实物、制度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读书界 I

新罗接受儒学以后，将儒家理论用于治国安邦，如《北汉山新罗真兴王巡狩碑》（韩国国宝3号，568年刻成）中有这样一段碑文：“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修己以安百姓”一句就出自《论语·宪问》篇。新罗统一半岛前夕的几位国王都重视儒学，加强与唐朝的政治、军事、文化联系。如善德王九年（642）“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真德王二年（648）“冬，……遣伊漉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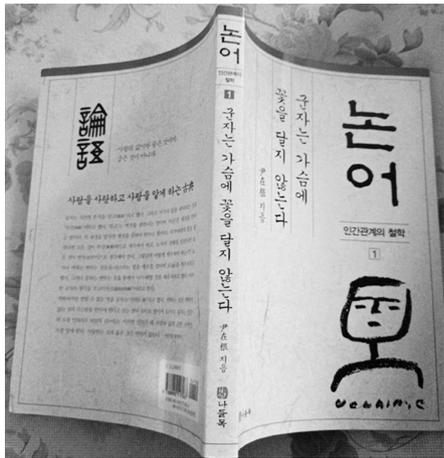
统一半岛之前的新罗，主要借助“世俗五戒”和“花郎道”思想来传播《论语》，特色鲜明。“世俗五戒”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与《论语》的主旨基本吻合。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新罗人在特定场合能够恰当引用《论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如624年百济大举入侵，沙梁郡人讷催引用《论语·子罕》篇曰：“阳春和气，草木皆华，至于岁寒，独松柏后凋。今孤城无援，日益阽危，此诚志士义夫尽节扬名之秋，汝等将若之何？”“花郎道”坚守“世俗五戒”，是新罗培养、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独特模式，融三教于一身。人们在贵族子弟中“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著名的“花郎”有仇梨、钦春、官昌等人。“花郎道”这种传播《论语》的独特方式在新罗统一半岛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统一新罗的历代统治者均重视教育。682年，神文王（？-692）设立国学，并效仿唐朝，将《论语》和《孝经》指定为必修课程，从国家制度的层面确保了《论语》的传播范围、力度及效果，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史上的重要坐标。圣德王十六年（717）“秋九月，入唐大监守忠回，献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

即置于太学。”惠恭王十二年(776)“二月,幸国学听讲。”景文王九年(869)“又遣学生李同等三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业,仍赐买书银三百两。”这些措施都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也有力推动了《论语》的传播。统一新罗还推行了“三品出身制”,以文才选人,《论语》仍是考察的基本项目之一。朝鲜半岛的儒学教育由此形成了新的局面,而《论语》已经被明确列入重点学习、考察的经典行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的士人更加深入地学习儒家经义,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体悟《论语》“内圣外王”的哲理,很多人能够自由运用《论语》来抒情言志。如《三国史记·金庾信列传》载其言曰:“吾闻见危致命、临难忘身者,烈士之志也。”其中“见危致命”一词出自《论语·子张》篇。《百结先生列传》曰:“岁将暮,邻里舂粟,其妻闻杵声曰:‘人皆有粟舂之,我独无焉,何以卒岁?’先生仰天叹曰:‘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来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伤乎?’”其前两句话分别出自《颜渊》篇和《微子》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文学作品

中出现了很多《论语》元素。崔致远(857-?)被誉为东国文宗、汉文学之祖,年轻时入唐学习,其诗《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曰:“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守道惟稽古,交情岂惮贫。他乡少知己,莫厌访君频。”其中“颜氏巷”就源自《论语·雍也》



读书界 |

篇。回国之后，他在两篇碑铭的《序言》中也引用了《论语》中的词句，《智证和尚碑铭序》云：“其具体则身仞余，面尺所，仪状魁岸，语言雄亮，真所谓‘威而不猛’者。”“威而不猛”一词引自《论语·述而》篇。《真监和尚碑铭序》云：“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吾岂匏瓜，壮龄滞迹？”两句均引自《论语·阳货》篇。尽管引用的数量不多，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论语》就正式走进了朝鲜的文学作品中，其词章、义理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依据和基础，被使用的频率更多、发挥的空间更大了，《论语》的传播也随之更为广泛。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跨越了千年。在传播过程中，历朝历代都看重《论语》中的伦理思想对社会、人生的重要指导意义，强调对“忠”、“孝”思想的体悟、践行。因为当时还同时存在着原始宗教、佛教、道教等思想，所以《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并没有成为朝鲜半岛这一时期唯一的指导思想。

总之，《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是《论语》魅力逐渐展现的一个过程，它提高了朝鲜半岛的儒学水平，为《论语》在朝鲜半岛的继续传播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是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东亚汉籍之路”，奠定了儒家思想域外传播的重要基础，是研究儒家文化圈的构成、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要证据。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论语》在日本的传播

刘萍

对日本文化发展而言,中国的《论语》是一部不能被遗忘的经典文献。日本对于《论语》的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相。经历了从意识形态本体向言说对象的转换,在近代思想学术的砥砺催生下,日本对于《论语》的研究,脱离了以往经学的藩篱而纳入近代诸学科体系,构成了表达其近代文化观念的场域,同时并促发了近代作家的《论语》文学创作。本文旨在立足异文化理解视角,揭示日本《论语》学作为“方法”的文化学意义。

汉籍在东亚的传播,《论语》无疑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经典。作为儒家学派创始者孔子的言谈总录,《论语》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就日本文化发展而言,《论语》也是一部不能被遗忘的经典文献。《论语》传入日本伊始,即受到极大关注,因应着日本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需要,对《论语》的研读、奉习旷日持久,以致日渐深入。及至近代,日本对于《论语》的研究更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广泛地展开,而其呈现的丰富多样的面相,既与近代学术思想的砥砺勃发攀援交错,更与中日两国异文化之间的理解认知交互指涉。

一、从信仰之“本我”到言说之“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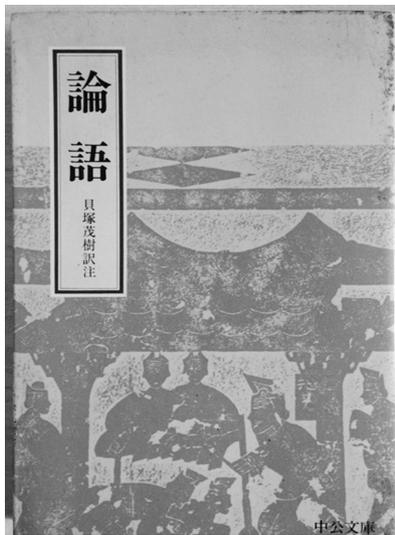
如果以近世江户时代(1603-1867)作为《论语》日本传播史上

读书界 I

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间带”，那么，当此之际，《论语》文本已经完成了从钞本到刻本的发展演进，即《论语》日本传播史上最重要的和刻本《论语集解》，至此阶段也已相当成熟和完备。接踵而来即将登场的，是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本汉学家《论语》注释之作——伊藤仁斋（1627-1705）的《论语古义》与荻生徂徕（1666-1728）的《论语徵》。

原本随宋学东传日本，朱子的《论语集注》作为新学已于镰仓时代（1185-1333）末期进入日本汉学家视野，进入江户时代，“朱子学”更跃升为幕府御用之学，大有取代旧注之势。废古注采新注的文教潮流无疑提升了“朱子学派”的政治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不期然地促发了学界重逻辑推理的倾向，并由此引导出新的学说的产生与交锋，甚至出现了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学派，其中以“古学派”学人的反击最为直接。在有关《论语》的解析释读中，以“古义学派”伊藤仁斋与“古文辞学派”荻生徂徕最具代表性。

伊藤仁斋少年时期即读《四书》，青年时代曾笃信朱子之学，自以为深得其底蕴。然至中年，对于惯所崇奉之义理之学始不安于心，认为“学者多狃于旧闻，牵于意见，卒无以得孔孟之正宗。不高则不乐，不奇则不悦，厌常而喜新，舍迩而求远，予甚悯焉。乃缀辑鄙言，以明邹鲁之正传。”遂“悉废语录注脚”，撰写《论语古义》一书，意欲复归儒学之本源。伊藤仁斋极端推崇孔孟，称“夫子之德实越过群圣，夫子之道超出于天地”。认为“孔子之圣，贤于尧舜远甚，而孟子愿学孔子而得其学”，故“若使孔孟复生于今世，则其所言所行不可过《语》《孟》二书”。对于《论语》一书，伊藤仁斋视之为“万世道学之规矩准则”，称《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凡此种种，足见伊藤仁斋古义学派之核心观念无疑即在于回归孔孟之旨，以求复原儒学本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论语古义》中，伊藤仁斋以“乡党篇”为界，将《论语》二十篇分为上、下两部分，称之为“上论”和“下论”，认为只有“上论”才是“古论”，而“下论”则是作为补遗由后人续辑而成的。这在中日两国学者中，都属最早的尝试。

以“仲尼为吾师”，奉《论语》为至尊的伊藤仁斋，初以宋学为信仰，复以孔孟为主臬，然而在文本材料的判定

上，则极尽证实与证伪，力求得“古义”之所存，这样的努力，事实上使其“得孔孟正宗、明邹鲁正传”的本体诉求，表现出某种客体化的倾向。

荻生徂徕早年亦曾接触朱子学，后一度转而追随伊藤仁斋古义学。及至晚年与伊藤仁斋“古义学”决裂，复创立“古文辞学派”（亦称萱园学派），其《论语徵》即为针对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所作。与伊藤仁斋极度推崇孔子、尊奉《论语》不同，荻生徂徕的研究恰以孔子所要继承的先王之道为据，因此，荻生徂徕反对像朱熹、伊藤仁斋那样，以作为孔子的发言而想定的主题来设定《论语》，主张《论语》乃孔子与弟子“论定”先王诗书礼乐时之所言，弟子出于备忘之考虑而加以记录，仅此而已。

荻生徂徕认为，要真正理解古典文本原意，就必须立足古文辞本身，以求做出历史性的考察。就《论语》而言，对以往的注释，荻生徂徕无论古注、新注，皆不予肯定，而是要尝试做出自己

读书界 |

的新解。因为“古言明而古义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矣。……是以妄不自揣，敬述其所知。其所知者，盖阙如也，有故，有义，有所指摘，皆徵诸古言，故合而命之曰论语徵”。荻生徂徕特别强调，仅仅依据注释者的主观臆测而对《论语》做出妄断，“实在是最大的失误”。故此，其所言之“徵诸古言”的做法，在《论语徵》中随处可见。

荻生徂徕热衷中国文化，景仰往圣先王之道，但坚决拒绝盲目崇拜，更加反对臆断之学。对荻生徂徕而言，《论语》实乃“圣人之言而门人之辞也”，因此，要想理解《论语》这部在古文辞方法驱动下诞生的文本，就要明了古语出典的世界，同时亦有必要了解，在新的文章的前后逻辑关系中，是怎样的意义从古语中被抽离出来。正是基于这种对于历史性、客观性的推重，荻生徂徕的《论语》释读，在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上，更加趋向远离观念信仰形态，而更加向客体化的他者立场迈进了一步。

作为江户时代“古学派”的汉学家，伊藤仁斋以倡言探求孔孟之旨反对宋儒义理之学，荻生徂徕据考证学立场对朱熹的《论语集注》展开批判、重新加以研讨。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原本都出身于朱子学之门，而后经过多年的学术研判，皆奋而转向，开创各家之主张。他们高张复古旗帜，大胆质疑宋儒之说，以此作为方法，向具有官学意味的朱子学发出挑战，实现对于江户汉学的反思与重构，并为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做好了充分的奠基。

二、从经学到近代人文学科的“多样相”分化

《论语》的东传日本，首先即与人员的迁移、书籍的流通不无关系，因此围绕《论语》的研究，也借由特定的地理条件、特殊的人文环境而渐次展开，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专门性的学科门类。随着《论语》所承载的中国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开始从

日本传统意识形态的“自我”，逐渐过渡为一个“他者”，《论语》从曾经的表达日本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自体观念存在，逐渐变化为可以被言说、被讨论的客体对象。在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催生下，关于《论语》的研究，讨论的边界也日益学科化、体系化，也即《论语》从古来的一部经学文本，开始被分别纳入近代人文学科体系中加以考量。

在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史上，儒学文化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日本汉学史就是在对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受容中建构起来的。及至近代，日本对于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评判，尽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中国儒学的探究，仍然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重要一翼。作为转载儒学文化的重要经典文本之一的《论语》，在近代文化语境下，获得了来自哲学界的新阐释，其中既有以服部宇之吉（1867-1939）、宇野哲人（1875-1974）为代表的“以伦理释孔教”的“孔子教派”，亦不乏如狩野直喜（1868-1947）、武内义雄（1886-1966）等注重文献考订的“古典解释派”。与经学向哲学的蜕变相一致，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形成并渐次发展的过程中，原本“捆绑”于经学之中的历史学、文学亦纷纷挣脱束缚，独立而成近代学科之一门类。在此情形下，原本仅作为经学文献的《论语》，亦开始进入历史学、文学研究者的视线，成为他们借以表达各自近代史学观、文学观的分析研讨对象。如山路爱山（1864-1917）依据民间史学立场展开的孔子研究，再如津田左右吉（1873-1961）秉承历史批判主义主张、尝试将儒教理念加以剥离解构的“孔子思想与儒教之批判”，又如视《论语》为“难以忘怀的读物”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对蕴含于其中的“中国智慧”做出的文学性解读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视角各异的

读书界 |

阐释固然与论者个体差异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内在理路上,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共性,即所有这些言说,皆为基于日本文化的时代语境所阐发的、对于作为异质文化的儒学之“理解”,从中更折射出论者对于日本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深入思索。

以20世纪40年代前后相继刊出《论语》研究专著的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津田左右吉(《〈论语〉及孔子思想》,岩波书店,1946年)为例,在诸如专业领域、学养传统与研究对象的经验关系以及对《论语》的文本解读与思想史阐释等层面,都表现出各自独特的相异性。武内义雄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科,早年曾留学中国,作为“京都学派”传人,以秉承重视考据之学的古典学研究方法论而著称,后长年执教于东北大学文学部,主要承担“中国哲学讲座”。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文化研究中,武内义雄力主排除日本传统汉学的义理空疏之弊,实证地追求确立思想传承的历史确定性,其学说构成了一个系统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框架。津田左右吉则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青年时代曾就学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近三十年始回母校执教;二战期间曾遭遇“违反出版法事件”,战后又获颁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一生从未到过中国,却创建了以中日两国古代典籍与思想史研究为核心的庞大学说体系,以“津田史学”享誉日本近代史学界。作为日本中国学领域独树一帜的重要学者,津田左右吉以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视角考量中国古代思想历史文化,构筑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取向和富有创见的精神世界。

尽管二人在学术语境、专业分野乃至学风气质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日本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几乎相同的历史阶段中,对同一部中国古代典籍《论语》,投入了同样的学术关注,这一基本事实表明,曾经作为经学文献的《论语》已经被施之以来自哲

学、史学等不同向度的考量。另一方面,对于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的《论语》研究,日本学术界概以为前者“以清代考据学作为其学问之出发点”,属于传统文献学式的古典研究;后者则属于近代阐释学的思想史解说。然而,文献学的方法也罢,阐释学的方法也罢,都不过是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揭示文本形成、递嬗的历史真相,并进而对其蕴含的思想特质加以阐释,因此在两者颇具相异性的《论语》解读中,我们亦不难窥见其作为“异文化理解”的共通之处。在《〈论语〉之研究》中,武内义雄首先将《论语》篇章分别依据各篇成书的先后顺序整理为“河间七篇本”“齐人七篇本”“齐鲁二篇本”与“《季氏》《阳货》《微子》等篇”四大部分,进一步则从“思想变迁的过程”着手,对《论语》的内容即所谓“文本的原始意义”进行了思想史意义上的解析,最终指出“儒教的中心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推移的”。这一“原典批判”的问题意识不仅使《论语》成为了可以评判的解读对象,其最终的推论则进一步使《论语》作为文本的经典性遭到消解。继而武内义雄对儒教精神的探讨将《论语》研究向纵深更加推进了一步。既然《论语》作为一部文本在其形成、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形成”,其思想内涵也在不断因时因地而“被添加”“被推移”得以传衍,那么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教,在传至日本的过程中也毫无疑问地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移易。在与《〈论语〉之研究》同时期撰著完成的《儒教的精神》一书中,武内义雄强调指出,日本对于儒教的影响“绝不是生吞活剥地接受,而是采取批判性的取舍”,使之日本化而“最终归于精神上的一统,发扬而为忠孝一体、至诚本位的国民之道德,日本儒教之特色便存于其间而获得独特的发展”。此番论说充分表明,武内义雄的《论语》研究,不仅是自哲学领域展开的对于中国儒学思想的讨论,更是将其置于日本思想文化特别是日本儒教的

读书界 |

文化语境下所做的阐发。在经典的解构中,孔子所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说被消解,而日本儒教的精神世界得以建立,武内义雄的《论语》研究中折射出来的精神指向或许更在于此。

与武内义雄一样,津田左右吉在《〈论语〉及孔子思想》研究中,亦主张进行思想史式的“文本批评”的解读。他首先亦着手文本之厘定,指出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就“必须弄清《论语》中哪些是孔子的言论”?弄清它们是“以怎样的途径流传下来的”?以及“它们与后世的儒家思想的联系是怎样的”?对“《论语》是否真实再现了孔子言论”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在对《论语》的记载进行了近乎苛刻的删定之后,津田左右吉将《论语》的内容及孔子的思想高度浓缩在对“人伦道德”以及“政治之道”的关注上:“一方面对生活在那一时代的家族结构和政治形态下的人们,制定了具体的、富有实践性的行为道德规范,此即表现在家族生活中的孝悌及对君主的忠实。另一方面,由于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以家族中的家长的权力和君臣关系中的君主的权力为基础的,因此这种道德自然是要以服从权力为原则的,即道德服从于政治、依附于政治”。这一有关《论语》与孔子思想中“道德”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规定性的论说,实乃植根于津田左右吉对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认识。早在1920年发表的第一篇中国文化研究论文《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中,津田左右吉就曾将其理解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定义为“帝王中心的道德主义文化、利己主义文化、权力主义文化、尚古主义文化”。因此,津田左右吉在《论语与孔子思想》中对儒家思想的评述、对儒家道德学说中的负面因素的揭示,称得上是其一以贯之的思考。而这种立足于历史批判主义的立场,对中国儒学文化,包括《论语》及孔子思想所做的解析,从一开始又是与其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津

田左右吉看来,近代的日本已无须向中国学习什么,而研究与批判则是必要的。换言之,津田左右吉的中国文化研究,是为了廓清日本文化的本来面貌,将古代日本文化从“汉文化圈”中剥离出来,从而建立起独特的属于日本“国民国家”自身的“日本文化”形象。在津田左右吉精神世界的底流,始终执着于对日本民族文化内核的深入追寻,他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的文化是随着日本民族生活的独特的历史发展而独自形成的”。在强调这种所谓“独特性”的同时,自然涉及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以及日本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关系问题。因此,在津田左右吉“儒教批判”的背后,对中国文化的蔑视和排斥与其对日本民族文化的执着自豪恰成表里之势。

在对日本精神史的探究与建构中展开对于《论语》的研究,因此作为“方法”的《论语》当然就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传统学问的经典一而不过是诸多典籍中的一部文本;也不再被单纯地作为传布儒家实践道德的伦理文献一而成为推衍日本精神史的思想史材料。武内义雄与津田左右吉的《论语》研究,在追求日本民族文化近代性这一点上,表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三、从“圣人楷模”到文学想象

在文学与哲学、史学一样相继独立于经学而成为近代日本中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日本近代文学也在经历着自身的发展蜕变。一部分作家一方面接受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吸收、模仿西洋近代流派,另一方面,对于浸透于日本历史之中、同时也深深浸透于他们各自生命体验中的中国文化,又怀抱深刻的理解、充满深情的向往。在以中国古典为创作源头的尝试中,出现了以《论语》为蓝本、以《论语》中的孔子及孔门弟子为原型,构造其文学创作的作家与作品。其中作为近代日本文学家的“孔

读书界 I

子想象”而前后完成于二战期间的《论语物语》(1938)和《弟子》(1942),是两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论语物语》中,作者下村湖人(1884-1955)用28个小故事将《论语》中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记载,巧妙地进行了整理排列,完成了小说式的创作,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作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的传记,但同时亦真实地传递出其是作者在与现实生活的个体经验对照中生发的、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层面的理解。

下村湖人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英国文学专业,作为出发于20世纪初期的日本近代文人,从西学思潮中获得启发,从其诗学理论和文艺观的阐发中,可以看出对传统价值观展开的清醒的思考。他主张文学的至高境界应该是将严谨的道德教化与热烈的诗歌(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谋求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以实现对于生命的尊重和讴歌。秉承这一文艺观,下村湖人在《论语物语》中完成了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群像塑造。在下村湖人看来,《论语》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人类心灵之书,对于这种能够超越时空、长留于人类胸中的文化遗产,就应该以现代人的意识去解读它,以现代人的心理去解剖它,并努力从中发现人类自身。正是怀抱着这样的信念与渴望,下村湖人大胆地施行对于《论语》的再创作,他将纯粹个人化的经验体得运用于文本创作,以一个现代人、文学者、教育家的立场,感悟并再现孔子的思想情怀,从而塑造出一个“有思想的道德家”“有理想的政治家”“尊重生命、礼赞人性的教育家”的孔子形象,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努力实现理想主义与自然(现实)主义的和谐统一。

《弟子》的作者中岛敦(1909-1942),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是一个奇异的的存在。在其33年有限的人生中,正式发表的文学作品虽

为数不多,但身后却留下了令世人惊艳的文学光芒。虽然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文学专业,其享誉后世的作品中却不乏中国古典的影子,“其中所描绘的恰是拥有汉文学素养、保持强烈宿命感的东洋作家的心灵轨迹”。《弟子》描写的是孔子与弟子子路的性格、命运的故事,其主人公固然是子路,但对于出身于汉学世家的中岛敦来说,这部小说更是立足于扎实的传记依据而展开其孔子观的作品。因此,这部作品又不仅仅是一篇小说,同时也饱含着作者对人物思想实体的精彩分析与把握。《弟子》中对子路的刻画与对孔子的刻画同时展开,作家中岛敦心中的孔子则“通过孔门十哲中最富个性的子路的眼眸”一一展现。“率直单纯、直情径行”的子路与“循循善诱的教育家”孔子;对老师“敬爱信赖、忠诚相守”的子路与“慧眼识徒、青睐有加”的人生导师孔子;“一诺千金、明快阔达的好男儿”子路与“孜孜践行、阔达自在的大丈夫”孔子——子路、孔子的形象就这样被一点点抽取、提炼出来,在《弟子》中以浓郁的汉家(中国)风格闪亮登场。中岛敦取材自中国古典的历史小说,皆不仅仅是将中国古代的一个事件、一段插曲加以故事化的创作,而是要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思考,要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到精神上的共鸣。

(本文转自《国际汉学》)

《论语》在俄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孙苓玉 董晓波

《论语》在俄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可追溯到18世纪初。据可靠统计,《论语》俄语译本至少有17种,包括变译本、全译本、叙事性译本和文学性译本等。《论语》的俄译为俄国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向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中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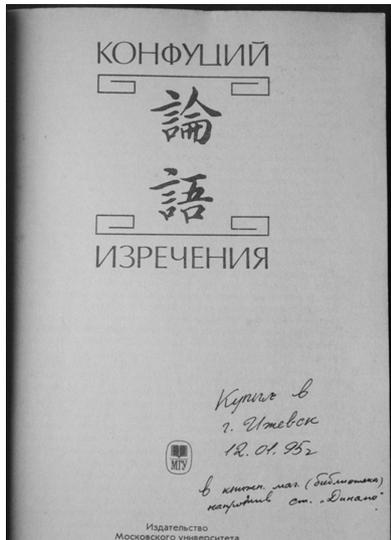
一、《论语》在俄译介体现时代特色

《论语》俄语的译介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帝俄时期(1721-1917)、苏联时期(1917-1991)和俄罗斯时期(1991年至今)。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源于彼得大帝的对外扩张。1715年,彼得一世下令正式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东正教传教团,虽然其任务是进行传教和学习汉文等语言,但实质是刺探中国情报,以此配合其对中国进行的扩张。但不可否认,此举确实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如罗索欣、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他们在中国访学期间,开始接触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并进行翻译。可以说,驻华传教士团成员为俄罗斯汉学的开创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俄罗斯汉学的基础。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迎来了第一次中国典籍翻译热潮,瓦·巴·瓦西里耶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868年,他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本并刊登在《汉语文选第二卷试读》上,还将《论语》作为汉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成为把《论语》引

入大学课堂的第一人,促进了《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波·斯·波波夫是瓦西里耶夫的学生,因受老师和牧师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加入到《论语》研究及翻译中来。1910年,其《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格言》出版,这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个最为系统的译本,对《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中苏正式建交,苏联开始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康拉德的《论语选》于1959年收入《中国文学选》,而波兹涅耶娃的《论语》节译本于1963年收入《东方古代文选》。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苏联掀起了中国儒学研究的第二次热潮,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关于《论语》翻译研究的大家。其中,卡拉佩基扬茨于1982年出版了《中国的儒学思想·理论与实践》,但该书主要介绍苏联各个时期儒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对儒学典籍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尚未过多探讨翻译的相关问题。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的伊万·谢缅年科教授于1987年出版了专著《孔子的箴言》,书中附有《论语》部分俄语译文。



同样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的马拉亚温,于1988年出版了专著《孔夫子与〈论语〉》,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二部分的《论语》译文及其所作的注释。该译本吸收了历代俄罗斯学者《论语》译本的精华,称得上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是俄罗斯国内汉学研究的典范。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学者们重拾对儒学的研究,希望从

读书界 I

中汲取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思想,因此《论语》的翻译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戈拉瓦乔娃于1992年在《边界》杂志发表了俄罗斯第一部《论语》的独立译本。1994年,谢缅年科根据前作《孔子的箴言》修改和补译成的《孔子·论语》出版,译文的注释更为详尽。他的译本在俄罗斯发行量最大,再版次数也最多,对《论语》在俄罗斯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2000年,亚·斯·马尔德诺夫的《孔子·论语》出版,翌年修订再版并更名为《儒学·论语》。该译本对于儒学特有的文化负载词采用先解释词意再加注括号标注音译的方式处理,推动了儒学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同年,卢基扬诺夫发表了《论语》译著,其排版采用了类似诗歌的方式,语言更为凝练。随着读者理解力的提高和对儒学兴趣的加深,这一时期的翻译侧重点和角度也在改变,在传承思想的同时,也注重形式的对等,从多角度、多维度进行解读和翻译。

二、中国译者缺席《论语》俄语译介

译介具体来讲分为“译”和“介”,其中“译”是译介主体和译介形式,“介”是译介途径和效果。通过分析,可以总结出《论语》在俄罗斯传播发展历程中译介主体、译介形式、译介途径和译介效果四个方面的特点。

译介主体经历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帝俄时期是《论语》在俄罗斯传播发展的萌芽和探索阶段,《论语》俄译的主体是向中国派遣的东正教传教团团员,以罗索欣和比丘林为代表的传教士担任了《论语》最初向俄罗斯传播的使者。《论语》俄译本的出现及完善,使俄罗斯开始关注《论语》及其包含的儒学思想。传教士回国后,很多都到大学里教授满语和汉语,同时继续潜心研习儒学经典,这对学生的学习研究方向产生了影响。此后,俄罗斯涌现出了大批研究儒学经典的汉学家,《论语》译介主体实现了从

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

译介形式经历了从教材到专著的转变。帝俄时期传教士回国后将其译本作为教材。俄译本的出现使俄罗斯读者产生了对文化认识的需要,因此,之后的《论语》俄译中增加了注疏家对论语的注疏以及汉学家对其的解读,以尽可能使读者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同时,《论语》研究方式也从译作评述过渡到思想研究,其呈现方式也从最初的教学用书转变为文学专著。20世纪末,随着俄罗斯汉学家对《论语》及其思想内涵研究的加深,译本开始大量以译作专著形式出现,发行量与再版数也呈上升趋势。

译介途径以目的语国的翻译力量为主。《论语》被译介到俄国,主要依靠目的语国(即文化接受国)的翻译力量,而很少有中国译者介入。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抱着不同的翻译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大都集中在《论语》英译和法译的研究上,对俄译本以及在俄罗斯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则关注较少。

译介效果和历史进程与中俄关系息息相关。译作在目的语国(即文化接受国)传播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文化接受国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以及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等。当译作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接受国即俄罗斯所倡导和追求的价值观相近或相同时,该译作就更容易得到接受和传播。《论语》在俄罗斯的译介经历了高潮低谷、起伏动荡的演变进程,译本形式由节译到全译,译本内容由简译到详译,甚至附带对注疏的翻译。译本的演化改进,与俄罗斯历史发展和中俄关系紧密相关。

三、文化输出需要全面系统的传播体系

《论语》在俄罗斯的流传和推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

读书界 |

在俄罗斯影响的逐渐深入和扩大。“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论语》俄语的译介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培养目的语翻译人才,满足国家战略和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经典典籍走出国门是第一步,文化“走出去”则需要借助翻译这个媒介,这就需要大量优秀的目的语翻译人才。应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从国家层面进行外语专业的改革发展,切实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

其次,依靠科技进步,明确文化接受国的需求。在进行典籍翻译工作前,也要做好关于文化接受国的调查研究,明确其文化诉求和国内接受度,合理调整翻译策略和外宣途径,真正做出适合接受国受众和传播效果良好的译作,从而将中国儒学经典典籍更好地推向世界。

最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主动融入目的语国家话语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翻译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儒学经典中的特有词汇将直接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语种体系。不同语言之间的碰撞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文化交融、互学互鉴提供了机会。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利于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话语体系产生影响,将中国儒学精神内涵传递到世界各国。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仅注重《论语》等经典典籍的译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构建全面系统的对外文化传播体系,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感受中国故事。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论语》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

成蕾 赵治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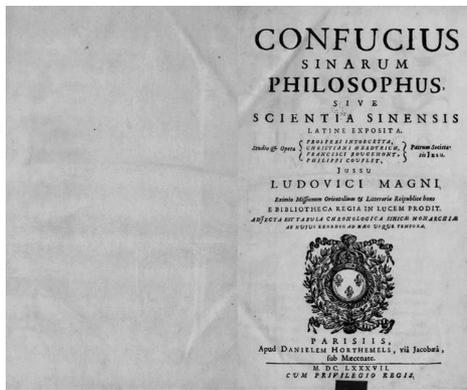
中国儒家典籍《论语》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法国汉学在世界汉学界地位颇高,成果丰厚,对《论语》的译介和研究历史悠久。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关于儒家学说对法国文化影响的研究,但截至目前,少有人以儒家典籍的译介为线索,来探讨儒家思想在法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文章梳理了《论语》在法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状况,展现了儒家文化与法国文化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下的接触、交流和碰撞,进而分析各时期不同境遇的原因。

《文心雕龙·原道》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是说论文说道要向圣人学习。《论语》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记录了“圣人”孔子和他周围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和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影响和决定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从最初开始关注中国文化的那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到今天作为法国东方战略智库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国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中心从未偏离过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文化。

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关于儒家学说对法国文化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或重在海外汉学史整理,探讨不同时期法国关于中国儒

读书界 |

家思想的研究状况、法国汉学家研究成果等；或关注翻译中对语言层面的研究，比较不同译本。笔者搜集、整理并归纳分析了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是期刊论文和极少数学位论文），发现以儒家典籍



为线索，探讨儒家典籍在法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的研究并不多。同时，先前的研究者由于法语语言水平所限，可能在研究中并未使用第一手原文文献，导致有少数论文出现明显的信息错误，甚至有未经严密考证就随意引用不实信息，以至于以讹传讹的现象。本文将梳理《论语》在法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之境遇，展现儒家文化与法国文化在不同历史、社会背景下的接触、交流、碰撞的过程，进而分析各时期不同境遇的原因。

一、法译本的“前身”：早期欧洲的拉丁文译本

法国对《论语》的最初认识，与中法思想交流史起源于同一时代。中国与法国的思想交流，包括文学、文化、宗教、艺术等，最初是从17世纪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的。17至18世纪有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是传播中国思想的垦荒者，他们的贡献之一就是翻译中国经典。

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是第一批抵达中国的欧洲耶稣会士。1579年罗明坚抵达澳门并逗留了八年多，期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礼仪。回欧洲后，他将儒家典籍《四书》全文译成拉丁文，翻译作品手稿至今仍然存放在

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有研究显示,罗明坚的翻译著作随后被发表,成为第一次在欧洲发表的汉学译著,遗憾的是当时欧洲主流社会并未对中国有太多的关注。

利玛窦到达中国后观察到,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培养始于《四书》,于是他也尝试将中国典籍翻译成拉丁文,随后又有至少17个耶稣会士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研究。虽然这部译著并未出版而且已经散失,但是他的这一翻译行为是可以考证的。利玛窦曾在通信中多次明确提到他翻译过《四书》,并将译稿寄回了欧洲。在1594年11月15日的信中,他提到:“几年前(按为1591年)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智能的书。待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甫,届时你就可以阅读欣赏了。”有学者认为,利玛窦的译著在当时的中国长期被作为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课本,并成为后来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lippeCouplet)等人所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底本。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化典籍、礼仪习俗的学习、研究和翻译,可以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源头,并直接影响了后来持续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欧洲“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也可以认为,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行为本身就属于“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组成部分,但由于这一批到达中国时间最早的传教士来自意大利,加之礼仪之争时间持续时间较长,故笔者在下文中将上述内容及他们的拉丁文译本单独评述。

二、“礼仪之争”时期的另类布道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大冲撞的一次重要事件。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将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震荡。来华传教士们就种种中国礼仪——如祭天祭

读书界 |

祖等是否是迷信或偶像崇拜、能否与基督教教义并行不悖、中国人对孔夫子的崇拜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欧洲人就中国礼仪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极大地动摇了欧洲封建神权的绝对权威，罗马教廷为息事宁人费尽周折，焦头烂额之下最终宣判中国礼仪属于迷信，禁止通融。

传教士在这场争论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介绍，这一时期对儒家典籍的翻译、对孔子思想的介绍颇多。“在所有的传教士中，入华耶稣会士可能是最有学问者。所以，唯有他们才理解绝不能正面与崇拜孔子的古老礼仪相对抗，因为孔子‘奠定了天朝帝国的社会制度形态，从而也确定了其行政制度’。”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合作翻译了《论语》拉丁文版本。1687年，巴黎出版了由柏应理、殷铎泽、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和鲁日满(Franciscus Rougemont)共同编著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书中附有《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这些译文就是以郭氏和殷氏的《论语》、《大学》译本为基础的。由于当时正值“礼仪之争”的高峰时期，拉丁语又是当时的“学术语言”，这个作为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一出版就反响强烈。该书在欧洲学界刮起了一阵中国思想文化之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地位颇为重要。

“中国礼仪之争”事件对儒家典籍翻译的掣肘之处在于，它使这些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工作饱受争议。随着传教士内部的论战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认为中国典籍翻译不应与基督教教条相悖，这使得教会中的本土主义者占了上风。在他们看来，耶稣会士们即使已经开始放弃他们信仰中的基本观点，试图与中国的迷信调和，结果也徒劳无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因素的影

响,使得《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虽然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并没有很快被译成其它欧洲语言,因此也未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可以算作《论语》和儒家著作译文的还有1688年法国人西蒙·富歇(SimonFoucher)出版的用法文撰写的《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Lettres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和让·德拉布吕纳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Chine),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此书是法国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但是,尽管书中相当详细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但是对于《论语》的处理则比较草率。同时,这两本著作并不是对孔子论著的翻译文本,而只是对先前出版的拉丁文译本的概括阐述。而且在这些概括性的介绍中,《论语》只是被翻译为几十条毫无趣味和文学美感的伦理说教“箴言”。书中并没有明确表现出孔子及其作品的具体内容和真实价值,因此很难使读者对此书有更深入的了解。

1687年12月,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历史文库》(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刊登了一篇对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书评,作者是法国新教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Clerc)。书评后附有由他本人从拉丁文转译成法文的16段《论语》译文。书评长达68页,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莱尔在其中显示出对《论语》的浓厚研究兴趣,认为孔子的思想广泛而丰富。他对之前耶稣会会士们的编撰著作中的某些信息持保留态度,认为他们模糊了孔子自己的论述以及孔子作品中某些段落出现的评注等。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没有汉字,使得读者不能区别正文和评论。

1711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ois Noël)的《中国典籍六种》,其中也收有《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此书后

读书界 I

来被转译成法文,于1784年至1786年间在巴黎出版。由上文可知,中国典籍作品传播至欧洲时,大都是先被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被转译成法文、英文和德文等欧洲国家各自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规律性线索。

三、18至19世纪法国的“汉学热”:对《论语》及儒家思想的推崇

法国一直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这归功于早期法国传教士和法国历代学者在翻译、介绍、研究中国典籍方面的重要贡献。从1776年起,法国开始编辑出版在华法国传教士的汉学论文集《中国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之研究》(十六巨册)、《海外传教士耶稣会士通信录》(十六卷)、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四巨册),这把法国汉学推到了一个独霸世界汉学研究之圣坛的地位。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书,该书46卷,是18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当时正处于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试图以哲学、理性的权威来代替基督教神权的权威。而经过耶稣会士翻译到欧洲大陆的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反宗教论者提供了攻击宗教文化的极好武器。他们对非宗教的孔子学说的理性客观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崇拜。但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家对《论语》及儒家典籍的了解主要是依托前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翻译译本,启蒙思想家们以此为中介,研究了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

对于孔子以德服人的气魄,伏尔泰表示十分赞赏;伏尔泰也

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为完美的一种政治体制。作为“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推崇孔子及其学说。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有些行为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在西方民众心目中,“救世主”耶稣的崇高地位是不言而喻、不可侵犯的,可是伏尔泰竟然敢将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并且早晚礼拜,二十年如一日。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该成为众人牢记的座右铭。自此之后,无数启蒙思想家都对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阅读相关的中国典籍翻译,而且还常常对典籍中的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了许多经验、教训。法籍德裔的霍尔巴赫(Heinrich Diefrich),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无神论者。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且他又提出“德治”主张,向大家号召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Denis Diderot)编撰了《百科全书字典》,在其中他赞叹说,孔子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而且,他也在其所编撰的百科全书中撰写“中国(Chine)”和“中国哲学(Philosophie des Chinois)”两个词条。此外,作为三权分立思想的提出者,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赞美过中国的德治思想,他说“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

纵观启蒙运动时期,尽管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儒家典籍《四书》是由传教士完成的译本,但是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译作曾经在法国,甚至在欧洲掀起过一股中国热潮,无数思想家因此为之倾倒,为之迷狂。儒家学说中的“仁”、“德”等核心概念更被广泛提及和运用到法国和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曾把《论语》里面所说的“己所不欲,

读书界 |

勿施于人”(Ne fait pas à autrui ce que tunc voudrais pas qu'on te fasse), 作为自由道德标志而写入他自己所起草的《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此外,18世纪重要的孔子研究著作还包括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于1785年出版的《孔子传》。钱德明被认为是入华耶稣会士中的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有关中国的著作很多,能用汉语、法语、满文、蒙文著书立说,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启蒙运动的浪潮过后,19世纪法语翻译史上产生了几部重要的《论语》译本。汉学家波蒂埃(Guillaume Pauthier)于1846年出版了《四书:中国道德和政治哲学》(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1846)。书中全译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并在导论和序言中做了相关评述,给予孔子极高的赞誉。波蒂埃译本的价值还体现在,与先前由拉丁文译本转译成的法译本不同,它是第一部根据汉语文本直接翻译而来的法译本。除此译著外,波蒂埃还有多部汉学著作,研究涉及中国历史、文学、文化,代表作有《现代中国:中华大帝国之历史、地理、文学述写》(Chine Moder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 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

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于1895年在巴黎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法译本(Les quatre livres: La Grande Etude, L'Invariable Milieu,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 Oeuvres de Meng Tzeu (Seu Chou))。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编写过辞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他是这时期汉学家中用法文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为卓著者之一。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 mierville)评价说:“顾赛芬的法文、拉丁

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他的翻译严格忠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没有做任何独出心裁的解释或个人评论的意图”,“顾赛芬的译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他的译本被多次再版,是《论语》众多法译本中最经典的译本之一。他翻译的儒家典籍除《四书》外还包括1896年出版的《诗经》、1897年出版的《书经》和1899年出版的《礼记》等。

四、20世纪以来《论语》法译的研究转向

如果说早期法国对《论语》的研究是以基督教神学研究附会孔子的儒家学说,启蒙时期对《论语》的研究是为自身革命寻求武器的话,那么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有了新的转向。这个时期的学者最大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等信仰的苑囿,以科学的态度和丰富的方法论,来研究《论语》和儒家思想。“一般来说,法国现在的倾向是更新传统性的汉学,甚至是断然地从中摆脱出来,一直超越传统的分界,并将从人文科学借鉴来的方法论(结构论、符号学、认识论等)纳入其中。”

这一时期,法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汉学研究机构 and 大学,其中较为著名的儒学研究机构有:法国远东学院(Cole Franc, aiséd' Extr ê me Orient)、法兰西学院(Coll è ge de France)、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d é 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des hautes é 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起设置汉学教授讲席,这标志着法国汉学研究从宗教化开始转向世俗化。法国多位著名汉学家都对《论语》的译介起过积极作用,有着卓越贡献。

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其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人思维》(LaPens é e chinoise)中,专列一章介绍孔子和他的人文主义精神。葛兰言多处引用《论语》的章节并做了翻译,特别是对其中反复出

读书界 I

现的一些文化负载词,如“君子”、“小人”等的翻译方式,做了专门探讨。

汪德迈(L é on Vandermeersch)是另一位直接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教学工作在过去的数年里一直集中在介绍中华帝国早期的儒学作家”,“在他的心目中,儒学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特征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

师从汪德迈教授的程艾兰(Anne Cheng)是法籍华裔知名学者,多年来也一直从事法国的儒学研究。她于1981年在法国 Le Seuil 出版社出版了《〈论语〉翻译及简介、笔记、地图和年表》(Traduction int é grale d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avec introduction,notes,carte-set chronologie);1985年,此书在同一出版社再版;1992年,又由该社收录在《人类的伟大经书》(Les grands textes sacr é s del'humanit é)丛书中再次出版,她的译本一直是权威的法语译本。除翻译《论语》外,程艾兰的儒学研究著作《汉代儒学研究》(tude sur le confucianisme Han,1985)和《中国思想史》(Histoire dela pens é e chinoise)均获得极高的赞誉。特别是后者,在法国和整个西方汉学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比利时汉学家皮埃尔·里克曼于1987年出版了《论语》的法译本,由东方知识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亚国籍的他以西蒙·利斯(Simon Leys)的笔名于1997年出版了《论语》的英译本。由于作者本人也是小说家,他在《论语》引言中谈到,他并非将《论语》当做思想巨著,而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他为他的译文预先设定的读者是普通人,而非学者。他的英语译本中注释旁征博引,涵盖大量西方文化,便于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相比之下,法译本中的注释偏少。

另外一个法语译本是由法国汉学家雷威安(Andr é L é vy)翻

译完成的。雷威安是法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童年时期在中国度过,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情结。他的译本《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录》(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于1994年在法国 Flammarion 出版社出版。雷威安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做了很大贡献,除《论语》外,他的著作主要还有《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白话小说》《中国古典文学概览》《金瓶梅词话》《西游记》《聊斋志异》《牡丹亭》等,这些译著被西方读者广泛阅读,在法国汉学界很有影响。

当代围绕《论语》的译介以及对儒家思想进行的研究,除上述翻译成果外,还体现在汉学家的研究中,包括当前在法国汉学界、比较文学界都引起极大反响的著名学者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马克(Marc Kalinowski)等。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马蒂厄(Rémy Mathieu)2006年出版了《孔子》一书,书中的翻译涉及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多部儒家典籍,并集中了包括四书五经、《孝经》、《荀子》等经典文献在内的主体性阐述。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王论跃教授在《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一文中有全面的介绍。

五、结语

通过整理法国对《论语》的翻译和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法国不同时期对这部典籍及其承载的思想的接受状况受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受当时法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法国社会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影响《论语》在法国的接受状况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笔者以这个标准,将本文的结构划分为早期拉丁文译本时期、礼仪之争时代、启蒙时期、近代和现当代。其次,受译者和研究者身份的影响。从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性理论、比较文学接受学理论、阐释学理论等角度,都可以论证这一因

读书界 I

素的影响。译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包括其教育背景、生活经历、职业等,都决定了他将以何种眼光、出于何种目的来阅读《论语》、用何种方法来翻译、研究《论语》。在上文中提到的译者和研究者中,有初次探索神秘东方的欧洲传教士,有想从东方智慧中寻求武器的启蒙思想家,有对中国文学文化有浓烈兴趣的汉学家,有单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当代思想家,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各自对《论语》的接受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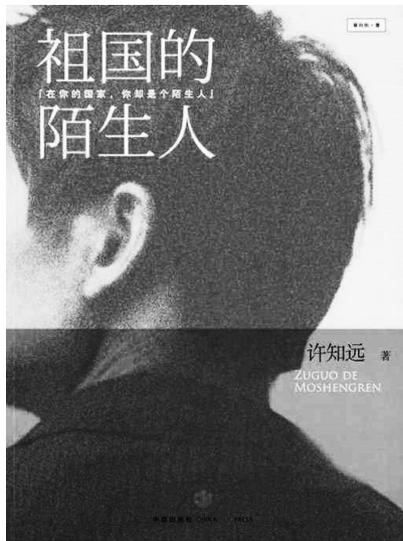
在当今法国学界,如何解读《论语》,如何研究儒学和中国思想,依旧存在不同声音之间的激烈争论。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论语》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但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源头,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文本,对它的研究在任何时代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转自《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重新开眼看中国

尧育飞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五千年历史，八千里山河，我们的试问：祖国，我曾了解你几何？“中国”，这炎黄认同，这华夏的血脉，何以今天突然模糊起来了？是九曲黄河万里沙吗？是长城巍巍山苍苍吗？是天山昆仑长飘雪吗？是万里长江东流水吗？都是！然而不够。地理的中国，没有人文的支撑，显然不配我们心中那完整的伟大祖国！寻找祖国，20年前有人



漂流长江，300多年前有人行遍名山大川，今天，同样的焦虑几乎再现——我们需要重新阅读我们的祖国！——这“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中华大地，我们要再次将你看清，因为我们爱你够深！

许知远因此做长远的奔袭，去阅读他日渐模糊的祖国，这本书叫《祖国的陌生人》。中国太大了，辽阔的疆域使得任何人都不

读书界 |

能不深思它的复杂性。我们的时代已然在发生疾风骤雨式的变化,然而死守文化传统的却还是我们!我们的认识已经远跟不上这改革的脚步了,于是许知远出发了,他以诗人的敏感、记者的犀利走中国的“胡焕庸线”,从黑龙江到云南,他试图解答心中的谜团:中国,究竟现在的你是怎样一副面容!也许有人要说,十几年了,为何许知远还是这副文艺腔、感伤调,这样诉衷肠式的追问究竟有没有意义?我说,文艺是直击问题的一条道路,这路有人走,总比无人问津要好吧!况且中国也并非缺少大视野、大情怀的人,2006年,韩毓海的《天下:江山走笔》正是宏阔叙事的代表。一个大气,一个细腻;一个昂扬,一个忧伤。然而都是追问,都是探寻——中国,现在的你究竟怎样?未来的你该走什么道路!

韩毓海“自远方”的哈尔滨开始走中国的大地,随后走进香格里拉,再掉头眼观上海,然后看日韩,看世界。思索中国的道路,始于中国,终于世界,然而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道路”,这样一本书却淹没在《于丹〈论语〉心得》畅销的年头,这是颇可遗憾的。寻找中国,汉唐已经明灭,周秦更是渺茫,明清及近代其实才是要害!韩毓海的眼光在此,他延续甘阳的“通三统”思路,觉得中国的历史没法割裂去看,毛泽东的时代如此,晚清也不能例外,祖先并非愚贫弱私,并非一无是处。相反,他们的远见卓识有待我们细心的发掘。传统,在韩毓海的笔下是如此的富有活力,以至于他看到了祖国旺盛的生机,未来朝阳般的前途。然而,许知远却有些悲观,同样从黑龙江“向南方”出发,许知远一开始便弥漫着失落和愁肠——那些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的,秦皇汉武以来的,都不存在了。普通老百姓的精神一片空白,年轻人满是空虚。他说“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了,传统早已经断裂,我们是无根的民族,精神一片荒芜,伪造出来的传统只加剧了我们的虚伪,凸显了我们的空洞与脆弱”。这里,许知远的怀疑如此

彻底！绝望之余甚至容不得叹息！中国，真的没有传统了吗？中国，真的道德覆亡、精神沦陷了吗？19世纪的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经形容那个时代的人“流浪在两个世界中间，一个死了，一个无力新生”。中国也许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然而不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人，最重要的不是争吵，而是重新去认识可爱的中国！“大时代当有大学者”！大时代当有大国民！汉唐气象，何尝不是贩夫走卒飞扬激烈的气象呢！

重新开眼看中国！天将降大任于当代国人，其在此乎？！

80多年前，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极为精辟的总结出中国的社会阶层和矛盾，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也正从此走向胜利！30多年前，邓小平高瞻远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语中的，并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今天，茫茫九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矛盾绝不消失”，它需要我们以犀利的眼睛不断找寻！中国，今天你的矛盾在哪里？你的症结在何处？——于是，韩毓海有江山走笔，许知远有个人“长征”。同样的万里奔走，同样的热血情肠，都是为了给以中国高分辨的摄像，去看清祖国的面貌！虽然视野不同，虽然观感有别，然而，所有自觉走上寻找当代中国的人都让人尊敬！

何以我们生长的沃土，生活的中国，竟陌生起来呢？原因其很简单，地理课本上的套话“幅员辽阔”就是最好的解释。它大，所以不能均衡；他无法像蕞尔小国那样均衡，于是地域之间千差万别！中国因此复杂，也因而丰富！它的辽阔和宏富，使我们从祖先到当代甚至未来都不可能完整地认识我们的祖国。然而不能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更并不意味着不值得去做！“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男儿热血，匹夫壮烈，也须把锦绣山河温一遍！况且今天人人都说压力大、幸福感低，都说我国处在转型期！——生于“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难道我们甘愿随波逐流，做那待宰的鱼

读书界 I

肉吗？不，我们要做真的猛士！要做创造历史的人民！所以，我们要看中国，要读中国！看懂和读懂我们的大中国，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更自主地生活！当然，知识人可能不止于此，以许知远论，是为了心中的惶惑，是为了寻找遗失的“士大夫文化”，是要寻求人文精神的园地；以韩毓海而言，是要为毛泽东造势，是要重新揭开纷纭扰攘的历史，以便解决当今世界的霸权威胁！知识人或者为了学问的登高，或者为了救世的热肠，或者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都将踏上寻找中国、理解中国的伟大征途！“为人民服务”，便是开眼开中国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曾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同理，没有调查研究也算不得开眼看中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前毛泽东将《长冈乡调查》作为“整风运动”材料分发全党，那是何等的眼力！的确，葡萄甜不甜不是书本说了算，也不是张三李四说了算，得亲口品尝才能得真味！韩毓海是走笔天下，许知远也不甘下风，两人都以游走山川城乡的方式观察中国。然而我们只能遗憾的说，他们只在表里走，中国的真精神其实何尝品咂到呢？韩毓海的眼光的确大，气魄也的确雄厚，但是他的观察、调研实在太少。满篇最多的是对历史文献的爬梳，是历史资料的大发现，然后是对毛泽东诗词和远见的讴歌！当然，因为他眼光的锐利，视野的阔达，所以在鸦片战争、日本等问题上都能独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小国战利，军国战兵，帝国战德”，日韩经济再腾飞，终究得仰人鼻息！再看他解剖日本人的国民性，我们得惭愧有时候自己实在做了日本右翼的帮凶，竟然美化起日本来了。历史当然容不得随意涂抹，但是“是非当得其平”。然而韩毓海终究还没有完全走出书斋，除了有限的几个访谈，有限的个人观感，他的绝大多数资料几乎都是历史文本的再翻身，底蕴是磅礴的，感情也是激越的，然而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人，韩毓海终究看得不透！所以，他的书

失之空洞！有血肉，然而多是前朝的！反观许知远，他的视角是偏狭的，因而敏感的呢喃多过宏大的勾勒。只看他对中国地质大学学生办报的了解，就能见出他的犀利！——中国的大学生，从未中止过怀抱天下的脚步！尽管经济热潮使它萎缩！作为大学在校生，我敢说许知远的直觉基本合乎现状！然而，许知远的文艺气质，使得他的敏感成为一种抱负，他能看出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他理不出头绪。比如，他说“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然而他的追问仅止于此，他无法作答！也许我们不该对这样的随笔散文做如此的苛求，可是，10年了，那个忧伤的年轻人还停留在“忧伤”（虽然忧伤的对象从大学扩展至社会），这就不能不让关心他的人担心了！何以如此？“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许知远的书生气从未斩断，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话来说，这个知识分子“改造”得不彻底！“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要调查，要认识中国，舍此别无出路！

行文自此，我似乎并没有论述为何需要“开眼看中国”了。其实这个词语中国人并不陌生，“开眼看世界”，从林则徐、魏源那代人开始我们已经整整做了170余年了。我们不断强迫自己融入世界，跟上世界潮流！先是“洋务”，接着是“维新”、随后是民主共和，再后是“民主”“科学”……一波又一波……世界贸易组织、奥运会……我们在紧追世界潮流时，的确收获了很多！民族、国家，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收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标志！独立自主的时代到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自己！遥想1946年，著名学者顾毓琇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这样写道“中国不复兴，世界绝不得和平，中国复兴了，世界也许可以和平……中国的责任太大了”。今天，和平离不开中国自不必待言，就是政

读书界 I

治、经济、环境等问题哪一样可以离了中国呢？这样说，绝非夜郎自大，也绝非固步自封，而是一种反省——那就是，盲目跟世界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是世界的重要份子，我们就是潮流的重要一支！理解我们自己，就是把握世界潮流！增加我们的文化，就是增进人类的文化！我们当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当有这等的豪情！当然，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和矛盾也是我们出发寻找中国本来面目的直接理由。许知远以为精神沦陷，人民空虚躁动，没有规矩，乡村失守，城市问题多多，因此他要找他可爱的中国，所以他在路上！他选择有代表性的“瑗瑗——腾冲”线作为旅行的中心，试图拨开迷雾见中国。他代表上世纪80年代人文梦寻者们的路径，也代表当代呼唤自由和解放的青年思潮，然而他所迷恋的传统多在1949年以前，尤其是民国，我们看他写陈独秀，写钱穆就不难发现他这样的梦呓了。而韩毓海呢？他执着于毛泽东的传统，虽然这也是植根于当代中国和它周围世界的问题，然而，过分迷恋于一人一时代的传统，显然并不能彻底了解中国，也无法回答当今中国社会需要寻找哪些突破口一类难题。毫无疑问，许知远和韩毓海都是敏感的文人，都胸怀故国的八千里山河，也愿意为中国把脉，给祖国绘象！但是，不够彻底，不够真相，他们这种随笔，最多起抛砖引玉的功效！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却还是热烈欢呼这类引领更多人踏上“开眼看中国”的征程的书！长远的说，我则希望全中国的人民都参加到“开眼看中国”的认识之路！“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那些满怀理想的少年郎，还有那些希望生活美好一点的人，都来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读一读我们伟大的当代中国吧！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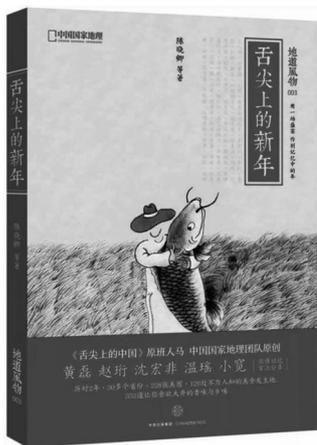
文化的寓言

——读《舌尖上的新年》

曹瑞冬

(中国过去)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化上有个春节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农村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正在被城市化的广大农民一时无法适应自己身份的更迭。诸城中漂泊的人口面对无数生存难题,渐渐地将故乡遗忘,甚至将文化之“根”拔起。许许多多承载中国故事的文化面临崩溃解体,我们不得不怀抱着后悔与拯救的情感让文化之花再度绽放。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种文化能永生不灭,但我眼里的许多文化却是在不断变化。文化之死,不必惊天动地,只需在一个应该死亡的时刻离别。但文化倘若与生存之事联系起来,其将拥有较为深厚的底蕴。从舌尖开始,欲望不断延伸,抵达人性中最柔软也最温暖的区域——文化,并由文化展开中国人对家、对人情、对



读书界 |

社会、对自然乃至对世界的思索，这一切思索都将汇聚成中国人对一切的寓言。

新年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记忆，也是每个人民心中深受感动的地方。谈及它的一切，并投射在丰富多彩的食物上，每一丝甜蜜、每一份色彩、每一缕情思都在传授我们生活应有的滋味。我们如何通过食物将新年多姿多彩的生活呈现，那可能便是中国人渴望的真实。新年编织出有史以来最纷杂的社会关系网，所走的每一步、所过的每一日、所爱的每一人都呈现出团圆最彻底的欢喜。

团圆，让漂泊的心回归，而食物则用着熟悉且陌生的味道将思念历经的等待变得值得。归家是新年的必需，年夜饭则是准备良久的团圆之象征。而年夜饭融入家庭、家园、家乡的特色，在浓情蜜意把幸福传递给每一位正在享受团圆的家人身上。国家是万千家庭的又一种团圆，而这种幸福的滋味传递遍华夏大地，因广袤的中国土地而显现出高贵的和谐来，每一道年菜，每一份年味儿都彰显出中国特色的内涵。文化并无高低之分，都在人的记忆深处留下了宝贵的中国之颜色。

家是漂泊在外的人儿恋着爱着思念着祝福着的根脉，从此处开始延伸，向着更广袤的天空发展。或许，人们争相与社会相融合的过程从一场年夜饭开始，并从更崭新的年菜拓展。人与人、人与社会在以美食为名义的餐桌上、厨房里开始交织出彼此生命最真实的模样。独立的生命与温暖的团圆之外的社会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交流，几乎是把人生交到了广阔的世界中，也将梦想传递给每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身上。爱的思念转变成爱的交融，我们尽管在漂泊在不断遗失文化的某些根脉，却也在更大的圈子中找寻一个真正活着的落脚点。

舌尖上的新年的一切故事，都是每一个华人用心写就的，并

以分享的方式将一年四季的酸甜苦辣悉数倒出,而新年也因此用食物传承出既孤独又团圆、既幸福又痛苦的文化寓言。这些食物带着手的温度,承载勤劳和智慧,也带着中国人对时光流转的感知,从农耕岁月一路走来,也终将在我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很多我们本以为可以守住的文化就在不经意间彻底地消失了,而很多新的美食、新的文化与这个时代的进步一齐融入我们的生活。新年经历过无数次风浪,但仍能通过美食将最传统、最坚守的文化与精神传承下来,这是因为舌尖上的新年绝对是一件关于生活、生命、人生的事。尽管我们无法充分发现失落的文化,但从这不断变化的食物和世间百态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开始以这些教训为起点守护住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用寓言向我们诠释的世界。

其实,新年在不知不觉中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是以舌尖上的名义,但至少我们还相信着中华文化所传递的寓言,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研究生)

《舌尖上的新年》从各个角度,深情讲述美食背后生动感人的故事。这里有舌尖上的美味,更有过年的人文内涵;有最高端与最简朴的烹饪秘籍,也有让人掩卷沉思的乡愁故事;有他乡,有故园,有连接起迁徙与轮回的千丝万缕。更重要的是,阅读这本书,能发现中国乡土之美。

——陈华文

为放心灵的三分菜地

——读《蔬菜月令：我的耕读笔记》

刘学正



种菜，对中国人而言似乎再平常不过，哪怕是钢筋水泥的城市，也不乏绿莹莹的蔬菜在阳台、楼顶，在泡沫箱子里卯足劲儿朝高了窜。当作家徐斌接过朋友交付的院门钥匙，拥有了一块真正意义上的菜园，他便翻地、播种、浇水、施肥、除草，把小菜园料理的朝气蓬勃。《蔬菜月令：我的耕读笔记》一书，是徐斌有感于每一粒种子、每一棵幼苗、每一片绿叶、每一

一朵小花，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字，这是一本记录种菜生活的散文集。在他笔下，远离尘世喧嚣的小菜园，有散漫的节奏，有细腻的日常，有奔放的情感，有对生命本真的一切美好期盼。

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辑，记录了作者种菜的点滴，以及对一年四季中蔬菜生长变化的感受。每一畦地，都是一锹一锹翻出来的，个中甘苦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每次劳作，都是一头一脸一身的汗水。一身浊汗让一个庄稼人时时安逸，夜夜酣畅，在他们的愁苦中，一点也没有对身体的担忧。所以每次挖地，我都是躊躇满志，双腋生风，似要飞至太空。”作者的笔触如山泉汨汨流淌，

沉浸在与妻子一同耕种的城市菜园里。任凭思绪游走在这部书所营造的情境中,好似看见那个虔诚的“城市菜农”以铁锹、锄头、镰刀在大地上书写的全过程,进而为他的娓娓诉说而感动。

镰刀“除旧”,铁锹“布新”,它们既是兵器,也是作者与草木、土地沟通的红娘。汗水不住地滴落,如同秋雨敲打,清音响起,犹如天籁。这时,妻子则用锄头把地耙平,像母亲为孩子铺床。“她把生菜种子、菠菜种子托在右手手心,左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成鸟嘴样式,再用鸟嘴啄出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神态安详,满脸喜悦,动作优雅,像在演戏。”种完茼蒿、芫荽、油麦菜,再播点蚕豆、豌豆,再栽点莴笋、洋葱、圆白菜……只凭恃想象,菜园便已展开无限绿意与生机。

各种蔬菜,一如人生际遇。徐斌写冬日里的青菜,“像极了戏剧中的青衣,素雅、端庄,安详、稳重。”不同的是,戏曲中的人物,多经坎坷,命途多舛,有的遭受遗弃,有的生活困苦,故有“抱肚子旦”“苦条子旦”之说;而青菜们则是开朗沉稳,乐观知命。他把空心菜看作是乡间极皮实的孩子,只是浇水,略施肥料,便蔚然成景。“一棵一棵,分蘖成蓬,贴地蔓延,铺满菜畦。从阳春吃到仲秋,还是碧绿。”同样皮实的还有芋头,经过一夏半秋,虽然千疮百孔,遍体鳞伤,依然倔强地站立。气色很差的是秋黄瓜,它们不言不语,满面愁容,相处多了,仿佛蔬菜也会撒娇。

菜园不大,仅三分地,却足以安放浮躁的心灵。在这里流汗、沉淀、思考、收获,徐斌寻觅到了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渐冷的生命开始回暖、热切,心底流淌出满满的爱意。阅读这本别有情趣的散文集,顿然发觉那些平日里叫得出名、叫不出名,堆垒在菜市场摊位上的蔬菜,竟也这般明媚丽人,这般温暖可爱。俯身小小菜地,耕耘如斯,收成如斯,内心恬静如斯。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阳谷县电视台)

洞悉“人生三味”

——读《味的人》

任蓉华

儿时沉迷口腹之欲，桃的甜，杏的酸，肉的香味和满足感，塞满了七荤八素的童年时光；初成人时，流连多种能激发好胜心的事物，滑板、电玩、棋牌……难以取舍的爱好以至“业荒于嬉”；而等到有了事业，有了家庭，整日浸润于酸甜苦辣咸之间，浮躁渐归平淡，方才体悟到生命本真，拼齐了“人生三味”。作家邱伟杰在《味的人》一书中说，“滋味、趣味、体味，构成了味的三个层次。”这部旨在对传统美学延伸和扩充的作品，由“味”而“品”，深入论述了生命与生活的全息面貌。

《味的人》既是一本诠释人生美学的通俗读物，也是一本笔调悠然的随笔集。该书阐述了“味”的三个层面：纯粹的味道，一境；趣味的审美倾向，二境；生命的动态体验，三境。邱伟杰说，在他浙江老家的方言中，“味”被读作四声的“Fì”，意思是快乐的、舒服的，“味否”即“是否快乐”。美，需要通过物质来呈现；味，也必须以人生为载体才可以淋漓尽致。而人生愉悦的养成，既非一朝一夕所能促使，也非千人一面，每一个人只有历经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方能到达快乐的彼岸。

《味的人》由“刻面的宝石”“人生艺术”“情趣探源”“欲望的回归”“走出困境”“体味，不断地体味”等六个章节组成，由浅入深，



层层递进,展现出在对美的追寻和探索过程中,不断迸发出的对人生的感悟和感动。以艺术家的姿态生活,是邱伟杰给出的忠告之一。他在书中写道:当你以人生艺术的思维角度,重新观察一遍自己的过去、现在,实际上就获得了一次重新梳理人生价值的绝妙机会。也许正是曾经的某样失去,成就了你好今天耀眼的得到;而往昔那短暂的得到,却带来了你人生永远的错失。当你把自己切换成艺术家的角色,并用完成艺术作品的方式来面对人生时,你一定会找到许多曾经错过的美。

叔本华说,人的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对此,邱伟杰提出要“欲望回归”。他说:“当你关注到不满的欲望,试图战胜自身的羞怯、无能、烦恼时,你放大了欲望的无限性,忽视了自己天性的不足。人人都是英雄了,英雄还怎会值得歌颂?只有当我们的天性本能,被外部社会阻碍时,才需要抗争。人的战争是由内抗外,抗社会绑架,抗‘非我’的。”欲望一旦被摧毁,生活动力也会由之而殆尽,一味地去扭曲、压制欲望,摧毁的可能恰恰是非凡之美。

街角的一碗芹菜馅馄饨,周末与三五好友的一场聚会,在某个午后回顾往事时的莞尔一笑,这些零落的点滴快乐,汇成人生的小美好。正如洞悉了“人生三味”的《味的人》里写道:人生在世,不长不短,日子时而快,有时却又慢。人的悲欢不一样,体验也有万万种,但它们终归都是有限的,是暂时的。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阳谷县安镇刘庙金凤包装公司)

我们都是追风筝的人

——读《追风筝的人》

李莹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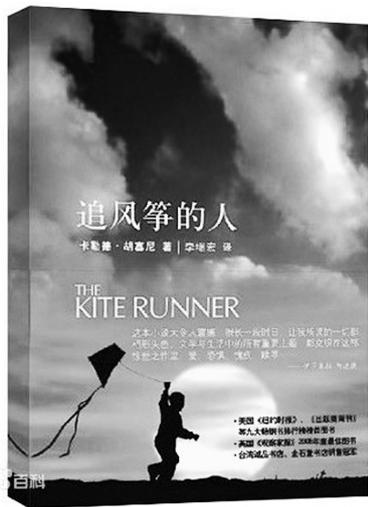
夕阳西下，余晖照耀着草地，到处都笼罩着晚霞的光芒。橘色和紫色交相辉映的夕阳下，一只菱形的风筝在草地上方飘扬。这便是这本书的封面。正是这幅美丽却哀伤的夕阳图景吸引了我，让我想了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那追风筝的人又是谁……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两幅相似的画面，天空广袤无边，雪花片片飘落，空气寒冷凛冽，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追逐风筝。同样的场景，在两代人的身上重复上演着，可这重复之间，主人公的命运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幅画面也从孩童的天真烂漫转向世事变迁的哀凉。

这本书所讲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阿富汗，说到阿富汗我先想到的就是战争与混乱，可本书却展现给了我们阿富汗的另一面，孩童们在羊肉飘香的街道里嬉笑着奔跑，街边各色小吃琳琅满目，本书的主人公阿米尔和哈桑便经常在这街道里玩耍。十二岁的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他的仆人哈桑情同手足，阿米尔曾这样回忆：“我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我们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错的树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与强盗，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虫

……”。作者所描绘的一切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仿佛日子会一直就这样在平静的午后阳光中度过。作者的这些文字也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忆起儿时的玩伴，还有那和小伙伴一起在夏日中午的阳光下奔跑却不觉得热的日子。那时的我们，不忆往昔，不盼未来，似乎只有当下的欢愉。可那时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无论有心或无心只过，都会和美好的事物一样，根植在我们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风筝大赛是阿富汗当地一项传统的活动，可在一场风筝比赛后，两位少年那欢愉的生活，就此改变了。阿米尔对父亲的爱与赞赏有着相当强烈的渴望，每次拿到风筝大赛那最后一只被击落的风筝，是阿米尔眼中唯一得到父亲赞赏的机会。哈桑是当地的追风筝高手，每到这时候便义无反顾的为阿米尔追得最终的那只风筝。在一次风筝大赛中，哈桑替阿米尔追到了风筝，同时却被几个坏孩子抓住欺负甚至猥亵，阿米尔看到了这一切，但他那软弱的性格却让他选择了沉默与逃避。与此同时，哈桑却坚定的和对手对质，不愿交出阿米尔的风筝。对手残忍的揭示了阿米尔和哈桑的主仆关系，哈桑却大声反驳说两人是朋友。躲在角落里的阿米尔听到了这一切，却依然没有被触动，就这样懦弱的躲着，直至悲剧发生。当哈桑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阿米尔却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甚至无视了正在顺着哈桑的裤子一滴滴留下的鲜血。不久后，阿米尔因为



读书界 |

自责而无法面对哈桑，便罪恶的把自己的手表和零钱藏在哈桑的床下，以盗窃的罪名逼走了善良又逆来顺受的哈桑父子。逼走了那个对他说出“为你，千千万万遍”的孩子。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做到了，他把两个男孩间那看似坚固的友谊摔碎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友谊终究是那么脆弱。但这友谊背后又是什么呢？或许命运是残忍的，哈桑从一开始就注定像他的父亲一样，做这个富丽堂皇的家庭的仆人，父亲侍奉老爷，他侍奉阿米尔。“他只是和哈扎拉人”，这句话也曾多次在阿米尔心头响起，仿佛种族早已替他们分出了高低贵贱。或许是命运，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对主仆的友谊注定悲伤。也或许我们都没有权利去指责阿米尔的过去，没有经历过，就无法感同身受，亦无从知晓这些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灵魂。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不久，因为战乱，阿米尔跟随父亲逃到了美国，想要开始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但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儿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是他错了，湖里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脚踝，将他拉进暗无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个鬼怪。”后来，在美国已经成为知名小说家的阿米尔接到了父亲的老友打来的电话，阿米尔在通话中得知哈桑已死，他要阿米尔回阿富汗，要他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从战乱中的阿富汗带出来，不仅是因为他以前辜负了哈桑，还因为哈桑其实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弟弟。阿米尔决定，再次回到阿富汗，他要找到“再次成为好人的路”。然而回到阿富汗的阿米尔发现哈桑的儿子已被敌人掳走。阿米尔的内

心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救出哈桑的儿子。在救索拉博的过程中,阿米尔被敌人暴打,以那孔武有力的残忍的拳头,打得阿米尔身负重伤,这一打,也打掉了阿米尔背负了二十多年的石头。让他得到了数十年来一直渴望得到的惩罚。最重要的是,引出了阿米尔在心中放丢了的那只以正义和责任为线的风筝。阿米尔用重伤之身,开始正式的踏上并完成了他的救赎之路。

风筝在本书中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友情,亲情,爱情……也象征着正直,善良,忠诚,勇敢。在童年的那次追风筝大赛中,阿米尔伤害了哈桑,他失去了心中的“风筝”。而故事的最后,在草地上,阿米尔替索拉博追得了风筝,索拉博打开了心扉,故事便在漫天飘扬的风筝中结束了。我相信,这时的阿米尔已经完成了赎罪,因为他追到了那只风筝,他追到了过去,救赎了现在。

念及那些如风往事,冷暖自知。也许我们的生命里都有一只想要挽回的“风筝”,谁没有另自己追悔莫及的事呢?但如果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被时光深埋的地点,重新面对心灵的拷问,不是每个人都有阿米尔的那份勇气,即使“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找到原谅自己的理由才能真正得救。过往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历久弥新。为你,千千万万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风筝,无论它是什么,我们都要勇敢的追。人生的旅途就是那片湛蓝的天空,随着天空中飘荡的风筝,我们仰望,我们渴求,我们追寻。这路途或许并不能一帆风顺,但没人停下追寻的脚步,因为,我们都是追风筝的人。

阳光正好,微风不温不燥。孩童们正在青草地上追赶打闹。苍穹之上,风筝飞扬,看啊,那追风筝的人,是你,是我。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追寻生命的意义

——读《追寻生命的意义》

海米雪

震撼！读这本书不能说会让人留下感动的眼泪，起码也会心头一震！

在集中营中，囚徒的所有财产和权利都被剥夺。在这里，生命显得格外渺小脆弱。可是据弗兰克尔观察，身体不那么强壮，却有丰富的精神活动的人，似乎更容易幸存下来，他本人就是实例。对妻子的思念和爱，让他在脑海中无比清晰地勾勒出了她的形象，并与她生动有趣地谈笑。爱，超越了时空甚至生死的阻隔，给拥有爱的人带去了内心的充实和强有力的支持。“将我像封条一样置于你的心上，爱，就会像死一样强壮。”过去的甜美回忆，同样能给困境中的人们带来安慰，弥补和滋润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空虚痛苦，更重要的是，指向了未来的希望：将来，我们会再次拥有这些幸福时刻！



为了活下去，囚徒们小心地节省食物，从死者身上“交换”衣物，调换转移到其它集中营的名单，冷漠地注视着其它人的痛苦和死亡。即使在这种文化和道德“冬眠”的环境里，却神奇地保持了对艺术和大自然之美的热爱，甚至感受更为强烈。“一位囚徒冲了进来，招呼我们去操场观看精彩的日落。站在外面，我们看见险恶的云在西边闪闪发光，整个天空布满了从铁红到血红、形状和颜色不断变化的云，……然后，在几分钟的寂静后，一位囚徒对另一位囚徒说：‘世界多美啊！在艰难绝望的环境里保持对爱和美的感受，在黑暗中不懈寻找光明和希望，给绝境中的人们带去了活下去的力量。

当回忆起这样一段岁月时，在弗兰克尔的笔下，我没有看到抱怨，没有看到愤怒，我看到的是他对命运的毫无保留的接受，弗兰克尔视苦难为生活的洗礼，他对生活的爱流露在每一个细节中，火车的汽笛，天边的落日和云，不美好的回忆最后变成了生活的馈赠，苦难酿成一坛甘甜的美酒

我喜欢这本书。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我们需要这样一本书，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我们不曾体味的世界，一个更能窥探人性的平台。我无法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弗兰克尔和他在集中营里人们的生存状态——胆战心惊地生活在日复一日的恐惧中，从惊恐到冷漠，以至于当重获自由时，他们甚至于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我们的时代是和平的，我们不曾历经战争，没有切身体会过寒冷与饥饿，也不曾经受肉体 and 灵魂的双重折磨，而在最黑暗的深渊中，弗兰克尔凭着爱、希望和乐观活下来，苦难也是人生的意义。“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都还有最后一种自由，选择自己的态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觉得当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这句话将会时时刻刻提醒着你，你不是无路可走，你

读书界 |

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供选择。首先,人生而自由,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选择对待他人和社会的方式,以及选择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很多人都曾经迷茫的问过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作者选择避开,而是巧妙地回答到:“人不应该问他生命的意义,而是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正是我们自己需要努力地去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些明白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人,他们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给他们的打击与痛苦。

可见,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仔细想想,生命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自己快乐?或者是为了别人快乐?还是自己努力地去去做一切事情就是为了能够舒适的活着?正如朱自清散文中提到的:我们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走这一遭,那些看上去属于我们的东西,其实并不属于我们。这样想来,平平地过完这一生难免会觉得无聊。不过试想一下如果自己生活在纳粹集中营里每天受尽苦难,连温饱都无法满足,甚至你根本无法预知下一秒你会不会死,就这样你活在不安与恐惧里面,你又能坚持活多久呢?人似乎都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但是如果静下来开始思考活着的原因时,似乎根本无法解释这种强烈的本能,生活这么艰难,充满了难以预料的痛苦,然而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活着,就像中国的一句谚语:“好死不如赖活着!”

举一个例子吧,当你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你会觉得活着的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大病初愈你会觉得健康才是人生一大乐事,那个时候什么功名利禄啊,荣华富贵啊,都是次要的事情了。我非常佩服作者超然的视角和冷静的头脑,处于集中营那样

艰难的一个环境中,连生命都受到威胁,却依然能够立足内心,以专业的态度去记录每一个要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在痛苦难以忍受时,作者还会游离于当前的环境,在心里和挚爱的妻子聊天。我想那个时候作者是幸福的。能够运用想象力从现实中抽离,是人独一无二的本领,帮助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存活。

联系现实生活,有许多有轻生念头的人是完完全全没有了生命的意义了么?其实不是。像弗兰克尔提到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种生活态度的转变,我们要这样问自己“我们能够给予生活什么”,知晓生活对我们的期待,然后认真生活下去,让生活来慢慢揭示答案。

另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弗兰克尔提出的“人的存在的自我超越”的观点,人越是投身于所爱的事业或人,对自己越是遗忘得多,他就越能实现自我。越是执着于对成功的追求,反而离成功越远;越是看重自我,追求自我的实现,那么就永远实现不了自我,只有超越自我后,才可能做到实现自我。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我想每个看到这本书的人,当想象若自己这样的集中营生活,肯定没有几个能够相信自己可以活下来,但是实际有人做到了。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做到。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是拥有并珍惜所有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的美好事物,是对过去生活的甜美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是对自己将发展成长为怎样一个人的好奇。无论任何职业、地位、财富和种族,当一个人有所担负、认真投入地生活着,并给其他人带去了幸福时,他自己也会感受到充实满足,此时,生命的意义就存在于生活过程本身!

其实我们不必患得患失,不必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但你觉得

读书界 |

忙碌不堪的时候试着想想你自己最美好的回忆,试着去接近美好的大自然,试着返璞归真。其实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你失去所有,包括金钱、爱情、友情、可是你还有亲人吧,还有你自己啊,你的身体就是你最忠实的伙伴,当你死了你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当你活着,你的身体就有存在的价值,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为什么要偏偏纠结于一件事情而不放手呢,世上从来没有绝路,因为地球是圆的,无论走多远绕多久你总会找到生命的意义,坚强、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

我们永远都也不应忘记:即使当我们面对绝望的情景时,当我们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我们也能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为那时可以最大程度地证明人的独一无二的潜力。

不是你追问生命的意义何在,而是生命正提出质疑,要求你回答存在的意义为何。

——弗兰克尔《追寻生命的意义》

微评《百团大战》

张燕如

1940年,祖国大地遍布囚笼,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突破重重封锁。娘子关,道岔上的遗体堆积如山,士兵仍然前仆后继;黄崖洞,16岁的战士将最后一颗子弹送进了敌人的心脏后,倒在了血泊;关家垴,大雪过后也隐藏不住喧嚣战火和飘扬的不灭旗帜。铁血的意志给了英雄们最强大的战斗力,怒火和仇恨化作凶猛的炮火,狠狠地打在敌人胸膛。一寸山河一寸血,无数先烈的血肉换来祖国之独立、自由,今朝且看吾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微评《长征》

陈 雯

这是一部两万五千里的壮丽史诗
这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
在二十世纪的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七百二十个日日夜夜 他们从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中一步步走来
他们从惊心动魄的反复绞杀中一步步走来
风潇潇马嘶嘶穿越雪山
雪皑皑野茫茫爬过草地
高原寒炊断粮意志如钢
诗浩浩歌漫漫创造壮举
这便是长征精神
使濒临绝境的旧中国从梦中惊醒
踏进了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无论何时
红军长征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
永不倒下
它犹如我们航行路上的灯塔
指引我们踏上新的征程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微评《永不消逝的电波》

王滢

信仰是什么？是五分钟超时后依然坚定地按电报机电键的李侠烈士，是明知丈夫抱着赴死的心态却依然支持丈夫事业的何兰芬，是接受到李侠烈士3个V的示警信息后盼望再次收到信号的报务员。黎明即将到来，而他，李侠烈士，却永远的留在了黎明前的那个黑夜。他，他们，是点燃黑暗的火柴，为我们擦亮新中国的光辉。英雄，值得被我们每个人铭记；烈士，值得被我们每个人敬仰；无论沧海桑田，他们永远是我们信仰路上的明灯。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舒亚东

李侠，因为一个任务，

你和一个陌生人结为革命伴侣并最终爱上对方；也是因为同一个任务，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人和未出生的孩子。

这个任务，是你明知自己会超时却毅然决然地践行那五分钟伟大。你牺牲了！但是在五分钟的时限过后，你的眼神中只有淡定和坚毅，因为你看到了新中国！

这个任务，是有助于破除国民党江防计划的绝密信息。从你的眼中我看到了悲壮；但悲壮之下，没有犹豫；有的只是坚定和无悔。

李侠，你就像一根火柴，藏于夜色，当火柴燃烧，你的生命终结，但同时，照亮了新中国的光明！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微评《亮剑》

秦道阳

《亮剑》是一部热血喷涌、有人情味的佳作。《亮剑》打破了之前脸谱化的角色形象,将英雄送还生活,在生活中重塑英雄。在电视剧中,男主角李云龙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他经常违抗上级的要求;没受过什么正经教育,“出口成脏”;解放后,李云龙和田雨的好友张白鹿险些发生了婚外情等等,这是与过去那种完人的英雄形象有很大出入。在剧中,楚云飞是一个有情有义、爱国的儒雅之将。他黄埔出身,有民族大义,治军严谨。逃往台湾前夕,楚云飞手捧一抔黄土,依依不舍离开大陆,场景感人至深。《亮剑》有扣人心弦的剧情。在《亮剑》中,李云龙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无论是战场、职场,还是友情、爱情。全剧的灵魂则是亮剑精神,这种亮剑精神使得全剧从爱国叙事向思想深度扩张,亮剑精神是全剧的一个极度浓缩,铿锵有力的声响不绝于耳。“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微评《我和我的祖国》

孙秀秀

站在二零一九年
我们回望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一九四九,一九四九
全国为之振奋的时刻
五星红旗随风飘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犹记那时
祖国遭人践踏,满目疮痍
时人将她辱为东亚病夫
一群青年凛然挺身而出
毅然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女排精神,两弹一星,嫦娥逐月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今天
她伫立于神州之东
高楼林立 经纬交错
揽月捉鳖 山河俊美
新四大发明是她新的名片
中华民族强起来了

读书界 I

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与拼搏
才使得而今的祖国于世界之林,傲然屹立
新一代的青年当高举,燃了七十年的炬火
坚定不移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祖国的现在和未来,扛在肩上
此火不灭,生生不息,精神长存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韩颖

广场上杆顶闪烁的火花璀璨了国庆的前夜;报纸上刊登的名字公开了最长的沉默;弄堂里两小无猜的暗恋奉献给了女排夺冠的瞬间;会场中滴答滴答的钟声精确了跨越百年的等待;鸟巢开幕式的门票轻抚着汶川小男孩受伤的心灵;草原上空划过的白昼流星指引着少年人生的方向;苍穹中返航的备飞绘画出舍己为公最美的弧线。回首七十载,每个历史瞬间都有回忆,都有你我共同铭记!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微评《谁主沉浮》

崔淑雅

这是一幅画卷，一部史诗
看到画卷听到史诗
我们看到
在那峥嵘岁月里
有枪林弹雨
有艰苦卓绝的奋斗
还有革命先辈们对人民的无比深情！虽没有悲怆惨烈的画面
但有心灵的撞击引发共鸣
虽没有千军万马的厮杀战场
但耳边依然响起冲锋号的声音
虽没有激昂澎湃的豪言壮语
却能看到领袖们气吞山河的魄力！虽未能直接表现新中国
的成立时刻
但我们在革命前辈的伟大领导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毛主席说，“一切热爱生活，争取自由，向往新生活的人民，是
永远压不垮的！”
感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下走上幸福的康庄大
道！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向伟大的革命先辈致敬！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在读学生）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分别是:《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角》(陈彦)、《应物兄》(李洱)。

一、梁晓声:《人世间》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数十部,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人世间》(三卷本)是著名作家梁晓声2017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全书115万字,历经数年创作完成。作品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艺术而雄辩地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作者感同身受，满怀深情，立足底层，直指人心，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小说佳作，更是梁晓声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

小说系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图书。

二、徐怀中：《牵风记》

徐怀中，1929年9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山底村。曾任西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解放军报社任编辑、记者，总政治部文化部文学创作员、八一电影厂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少将军衔。先后出版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小说选》，长篇纪实文学《底色》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底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路经“夜老虎团”驻地，因一曲古琴《高山流水》，与团长齐竞相识，成为他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汪可逾聪明灵动、冰清玉洁，齐竞文武双全、儒雅健谈，在浪漫激越的战地恋歌即将奏响之际，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骑兵通信员曹水儿高大威猛、勇敢果决，为齐竞所看重，也颇受女性青睐。但他时常自我失控，在漫天烽火中上演着一出“行军艳遇”，终于酿成了悲剧……在晋冀鲁豫大军千里挺进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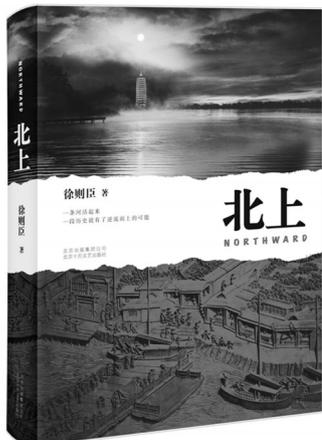
读书界 I

山的战火中,汪可逾、齐竞、曹水儿等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演变?那匹灵性神奇、善解人意的老军马又该如何功德圆满,死而无憾?

小说血色唯美,空灵奇崛。既有对战争、人性的深刻思考,也有人与大自然神奇关系的表现,亦真亦幻,拓展了战争文学的创作空间。

三、徐则臣:《北上》

徐则臣,著名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2016



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北上》是著名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本书阔大开展,气韵沉雄,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这一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一百年后的2014年左右,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四、陈彦:《主角》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

“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2015中国好书”,2017年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陈彦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说



读书界 |

秦腔》等著作。

《主角》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其间各色人等于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遇无不穷形尽相、跃然纸上，既发人深省，亦教人叹惋。丰富复杂的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在诗与戏、虚与实、事与情、喧扰与寂寞、欢乐与痛苦、尖锐与幽默、世俗与崇高的参差错落中，熔铸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说”。

作者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而经由对一个人的遭遇的悉心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忆秦娥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及其心灵史，也成为古典思想应世之道的现代可能的重要参照：即便内忧外患、身心俱疲，偶或有出尘之思，但对人世的责任担当仍使她不曾选择佛禅的意趣或道门的任性逍遥，而是在儒家式的奋进中觅得精神的终极依托。作者笔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之音，却在其间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小说遂成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

五、李洱：《应物兄》

李洱，中国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河南省专业作家，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9—2009）中国十佳长篇小说。《应物兄》为其最新



长篇小说，获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

一部《应物兄》，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

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所有人，我们的父兄和姐妹，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芒，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

本书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各篇章之间又互相勾连，不断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意义。它植根于传统，实现的却是新的诗学建构。小说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汉灿烂出于其里。

（本文转自《成都商报》）

2019年度金石学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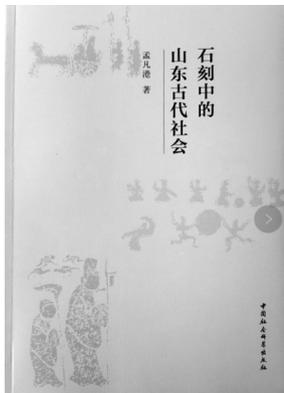
一、《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

作者：孟凡港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1

石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主干之一，凭借着保真性与持久性等特点发挥着其他文献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可补史之缺略，正史之讹误。山东作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石刻数量大，分布广，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丰富，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历史史实，更反映了山东区域社会和民间生活，见证了彼时的社会历史变迁。所以，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石刻资料出发，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重构历史，从而较为真实地展现已经消逝了的历史场景。本书稿主要依据具有代表性的曲阜儒家石刻、济宁汉代画像石、泰山封禅石刻、高密与淄川郑公祠石刻、长山范公祠石刻、巨野五代时期屏盗碑、山东各地纪游石刻以及胶东道教石刻等，对孔子及后裔、汉代济宁社会、唐玄宗与宋真宗泰山封禅、郑玄与范仲淹历史形象的演变、五代山东地方社会治理、山东古代旅游及金元全真教等诸多问题进



行考察,从而让山东古代社会历史以更清晰、更完整、更真实的面貌呈现现在我们面前。

孟凡港,1979年出生,河北平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博士后,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石刻文献学研究,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4项,在《光明日报》《历史文献研究》《世界宗教文化》《齐鲁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二、《〈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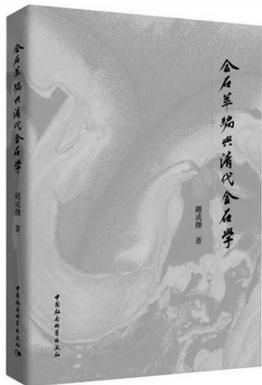
作者:赵成杰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5

《金石萃编》在金石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该书汇集了西周以来重要的金、石拓本,以“石”为主,为后世学人翻检、查考提供了便利;其次,以《金石萃编》为中心的续书、补书不断涌现,逐步构建起清代金石学大厦。对《金石萃编》及续书、补书的研究不但有利于考察《金石萃编》本身的学术价值,亦有益于对整个清代金石学史把握。本书采取文史结合的方法,从文献文化史的角度,将《金石萃编》作为一部学术经典,一种研究范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赵成杰(1987-),黑龙江宁安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尚书》学、说文学、金石学及传统文献整理与研究。已在《文献》《中国典籍与文化》《书目季刊》《岭南学报》《福建论坛》《国际汉学》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



读书界 |

两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博士后基金项目三项,入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三、《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

作者:全相卿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5

《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一书史料翔实,网罗宏富,取材精审,是在充分占用史料、并对史料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见功之作——虽然其中的若干观点还可进一步展开讨论。

全相卿,男,1984年生,河南滑县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在《史学月刊》《厦门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四、《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

作者:薛龙春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

出版年:2019-9

人称“司马小松”的黄易(1744-1802),不仅是书法、篆刻和绘画上成就卓越的艺术大师,同时也是清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之一。黄易的访碑、拓碑活动,在嘉祥重新发现并就地复建武梁祠;其首屈一指的拓本征集并通过刊布、题跋等等,三十年间,积五千件拓本的收藏,使得他成为乾嘉金石学中最活跃的关键人物,为后人留下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与



《小蓬莱阁金石目》等著作。

本书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入手,展开对乾嘉金石活动的生动记述。在“金石亦时尚”的潮流中,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各以友朋的身份纷纷登场。

作者以清代金石学家黄易为中心,围绕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的经典化策略,以及金石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重构了乾嘉金石学的社会生态样貌。

薛龙春,1971年10月生,江苏高邮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2008—2009学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

五、《清代碑学研究》

作者:吴高歌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5

《清代碑学研究》是关于清代碑学之兴起、演变以及对后世影响等问题的观察与研究。作者首先从传统帖学与早期碑学之异同出发,梳理了以邓石如、阮元为代表的碑派学者的理论与实践,并指出其与传统帖学迥异的审美取向。其次,作者将阮元书学南北之说,康有为书学的今学、古学问题的研究放置于清代学术的大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如阮元书学与乾嘉金石学、考据学之关系,康有为今学、古学之说与晚清今文经学之关系等问



读书界 |

题,这既是对清代学术史的延伸与补充,又是对清代书法史的夯实与深化,因而具有学术史与艺术史的双重意义。此外,作者关于晋帖、唐碑、欧阳询、颜真卿以及篆分遗意等问题的研究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清代碑学的旨趣与实质,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与研究都使该书更加详实、深入。

吴高歌(1967-),山西万荣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博士后,现为华北电力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中国书法史。近年来在《中国历史文物》《中国书法》《书法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六、《中国古代石刻概论》

作者:赵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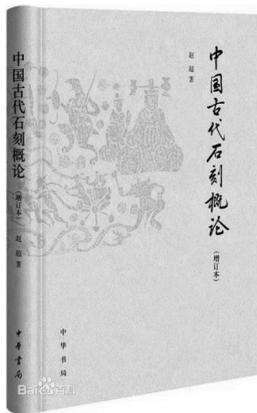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19-8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概观性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石刻的类型及其演变、古代石刻的存留及发现情况、历代石刻的研究情况以及石刻铭文的常见体例,总结归纳了石刻铭文应当如何释读、石刻及其拓本如何辨伪鉴定等,是一部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古代石刻的基础著作。

本书1997年曾由文物出版社初版,此次为增订本,增加内容逾倍,新加图版200多幅,随文相配,使本书更具可读性和直观性。

赵超,1948年10月生,北京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197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10月至1991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1991年6月起任职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要从事汉唐考古与古代铭刻研究。撰著有:《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新唐



书宰相世系表集校》《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古代墓志通论》《我思古人：古代铭刻与历史考古研究》等。

七、《过眼与印记》

作者：朱万章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

出版年：2019-8



美术史与书画鉴藏密不可分。我们熟悉的中国美术史，都是建构在作品鉴定与收藏基础上的。基于此，本书讨论的范畴，是作者过眼宋元以来书画名迹留下的关于美术史的深刻印记。无论是诸葛亮、朱元璋、董其昌形象的塑造，还是陈容、王蒙、仇英、傅山、吴振、王翬、吴昌硕绘画的生成，以及赵孟頫、何绍基书法的嬗变与传播，甚至鲜有人关注的岭南四画僧、明代醉饮图和葫芦画的疏证，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美术视角。作者利用供职博物馆的优势，结合各地馆藏资源，从书画本体出发，抽丝剥茧，解读书画内外所蕴含的文化与艺术基因，探讨鉴藏中作品的真伪、传播与影响，为人们深度了解不同时期的美术提供参考。

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从事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著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书画鉴真与辨伪》《画林新语》《画里晴川》《梧轩艺谈录》《鉴画积微录》《明清书画谈丛》《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等。兼擅书画，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学之余：朱万章绘画近作集》等。

八、《陕西碑刻总目提要初编》

主编：吴敏霞

读书界 I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1

《陕西碑刻总目提要初编》系陕西省“十一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大项目、《国家“十一五”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和《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陕西碑刻总目提要》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收录陕西境内历代碑、墓志、墓砖、摩崖石刻、造像题记、经幢、塔铭等多种类型的石刻资料;所收各类碑刻年代上自秦汉,下迄民国末年;所收碑刻的著录信息包括碑名、年代、形制、行字、撰书刻者、纹饰、出土地、现藏地、著录情况及提要等多方面内容。

九、《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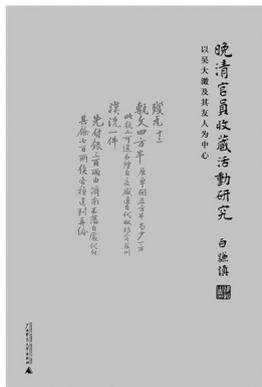
作者:白谦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

出版年:2019-9

本书是“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整体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以吴大澂及其周围的官僚群体为中心,探讨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收藏活动的社会机制。晚清官员收藏活动得以展开,涉及多种社会因素,包括藏品买卖的信息传递、交通运输和支付方式,以及晚清官员的收入和支出、官场各种礼金往来的规俗等。作者利用大量未曾刊布的稿本、信札等材料,细致还原了整个收藏过程,并以此为切入点,与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若干理论进行对话,其背后所蕴含的思考方向,更是值得研究者引起重视。



白谦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5-1997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1997年至2015年6月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4年获终身教职。2015年7月后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现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

十、《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

作者:[英]柯律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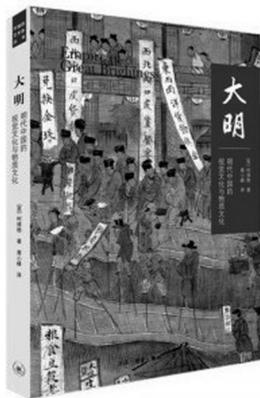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

原作名: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译者:黄小峰

出版年:2019-8



《大明》是一部具有创新性和可读性的历史读物,通过丰富的图像和实物材料,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明朝。前七章分别讨论明代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中的七个侧面,为现代读者进入明代历史提供了一组新颖的切入点:有关“动”与“止”的观念,有关图像与知识的分类,有关文字书写的位置和特色,有关空间和时间、娱乐和武力的视觉表达……第八章则讨论了明代灭亡之后的“明代”,即明代的图像和物品如何被重新编排、重新想象。作者把全书比作一幅绘有八个段落的长卷,并非钜细靡遗,但具典型性。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文学学术资源在线》)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推荐好书

一、《70年邮票看中国》，李近朱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推荐理由】邮票，作为一国的“国家名片”，是国家记忆的忠实记录，是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本书以新中国70年发行的邮票为素材，以富于邮册特征的“页面”为载体，按照历史时序，突出集邮特色，通过邮票上的丰富信息以及个性化的集邮故事，勾画出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也呈现了共和国“名片”的瑰丽形象。本书视角独特，结构新颖，资料珍贵，融史料性、艺术性、知识性于一体，具有一定的阅读鉴赏价值和纪念意义。



二、《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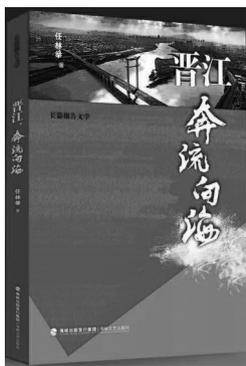
【推荐理由】作为江南闺秀和北大才子，樊锦诗本可以有更为轻松闲适的人生，她却将生命交付大漠流沙和洞中光影，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研究者，日复一日地临摹修复壁画，为古老的敦煌赋予新生。在



这本自述中,“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娓娓而谈,分享她在北大的求学往事、与伴侣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以及敦煌文物考古和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质朴的外表,纯真的笑容,用尽一生保护的璀璨的敦煌文明,都源自她高贵安顿的灵魂和一颗守一不移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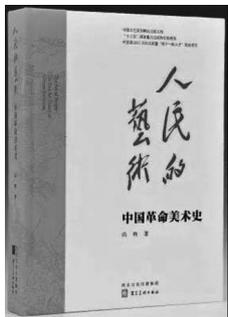
三、《晋江,奔流向海》,任林举 著,海峡文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晋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40多年来,晋江从一个农业穷县发展成为全国县域十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典范、中小城市建设样板。长篇报告文学《晋江,奔流向海》以散文文化的笔法,全景呈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晋江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晋江故事,深刻诠释了“晋江经验”,彰显了坚韧不拔、敢于拼搏、勇于创造的“晋江精神”。作品文辞优美,开阖有度,写出了晋江人逆境中坚韧不拔的品质,写出了晋江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文化发展史,更为探究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尚辉 著,河北美术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从历史与艺术两个维度回溯中国革命美术,用作品还原历史,用历史解读艺术,系统地梳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美术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创作特点以及时代意义,诠释了“中国的革命美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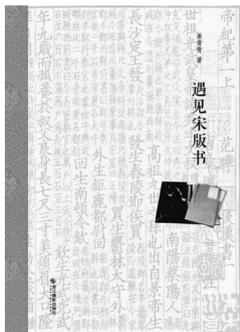


读书界 |

的深刻内涵。本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书中所选的大量经典美术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能引起几代人的情感共鸣,不仅是一部革命美术的艺术史,也是一部由视觉图像汇聚呈现的中国革命史。

五、《遇见宋版书》,姜青青 著,浙江摄影出版社

【推荐理由】宋版书的魅力,到底是在纸润墨香的天然古朴,还是在书法的名家气韵、装帧的精美考究?本书在大量有关宋版书刊刻、收藏、流布的史料基础上勾稽考订,充分参考清代至民国以来藏书名家的相关观点,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宋版书的雕印之用心、借阅之艰难、收藏之机缘娓娓道来。以古人对书籍的珍视,来反思今人对悠久历史的态度,以宋版书的文化积淀,来观照历久而弥新的传统文化之美。通过对刻书家、藏书家、著名书贾的细节刻画,多角度多层次地突出相关宋版书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拉近了普通读者与宋版书的距离,为大众打开了一扇认识宋版书的“窗户”。



六、《放下心中的尺子:〈庄子〉哲学50讲》,林光华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庄子其人,通透洒脱;其代表作《庄子》,文采斐然,意韵深远。这是因为他不为外物所动,“解构”世俗的标准和纷争,活出了自己的风格。本书作者立足现实,针对当下社会和心灵困境,讲解庄子《内七篇》,意在运用庄子哲学,使读者放下内心和外在的“尺子”,打破“框架”和“定



式”，活出像庄子那样自在从容的人生。书中事例鲜活生动，理论讲解通俗易懂，是一本理解庄子思想的入门图书。

七、《你好，安娜》，蒋韵 著，花城出版社

【推荐理由】人的一生很长，“恶”总会在某个地方某个角落等着擒获你。当你与恶不期而遇，该何去何从？是成为它的奴隶，还是战胜它？安娜、三美和素心三个闺蜜，用一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她们不断地用亲情和友情去忏悔罪责，弥补过错，最终找到了真相，获得了彼此的原谅，也使人生不再留有遗憾。生活或许与我们年少时期望的完全不同，友人各奔天涯，多年后杯子碰到一起，全是梦碎的声音。但是即便如此，也应心怀大爱，不断救赎，找回人性深处的至善。



八、《致江东父老》，李修文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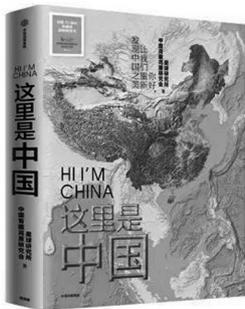
【推荐理由】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这些人从来不是别人，是我们记忆深处的江东父老。读这本书，其实是和记忆深处的江东父老重逢。作者写下他们，是要为世上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书中记叙了一个个困顿的生灵，描绘了这尘世的艰辛悲苦，见证了生命个体身处逆境中的向死向生，满满的苍生，满满的慈悲，在文字中流淌出来，合卷后性情不去，其味愈浓。



读书界 I

九、《这里是中国》，星球研究所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著，中信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是一部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备的地理科普作品，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与城市，以365处美景的照片和53幅专业地图为支撑，全方位展示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的地理大格局。由“中国从哪里来”开篇，以“什么是中国”为回应，从可可西里写到江南，将山川河流的肌理与人间烟火的



温情置于宏大的时间尺度下，既有俯瞰全局的视野，又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让读者在唯美的观感中，了解祖国大好河山的每一种气质与温度。本书不仅在知识上由专业团队把关，在制作上也力求完美，无论是用以展示札达土林全景的长达1.8米的拉页，还是有助于呈现跨页彩图视觉效果的黑脊锁线装帧，都表明这是一部值得珍视的匠心之作。

十、《花猫三丫上房了》，叶广芩 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推荐理由】著名作家叶广芩以古稀之年，用成熟的笔触，描摹懵懂童年的故事。全书以花猫三丫为主线，从小女孩丫丫的视角落笔，透过日常生活中一个个微小的细节，将家的温馨、朋友的真诚、街坊邻居的热心与善良融入世间百态的大背景。在活泼而幽默的



文字背后，有着通透而深刻的人生感悟，因而对美好童年的全景式再现，不仅是对天真烂漫的童年旧事的追忆，更是对温暖了一生的爱与善的感怀。其情深而意切，言浅而韵味悠长，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好书》）